

三民主義

刊 週

期 一 第 卷 二 第

新年特大號

元旦感言

共同前進

二十八年的結算與二十九年

的展望

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

中國共產黨問題

一年來的國內政治

一年來之中國經濟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九)

論建國

和平運動的認識

歐戰第三四月

史太林與第三國際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政治建設

一週大事評述



汪精衛

林柏生

周化人

胡蘭成

曾芝生

方芬克

望雲

白瑞光

鮑淑文

張立恭

燕妮譯

汪精衛

周佛海

褚民誼

編輯室

南京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

13 JUL 1940

本刊啓事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凡定戶定一年以上者，由本社酌贈本社叢書。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定價一元，不折不扣，外埠酌加郵費，冊數不多，讀者請從速購覽。

三民叢書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及重要決議案	曾芝生著	五分	已出版
和平戰爭與今日中國	曾芝生著	三角	已出版
中日和平合作的基礎	曾芝生編著	三角	已出版
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	吳無吾編	六角	已出版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	望雲著		印刷中
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	白瑞光著		印刷中
論行政制度的確立	白瑞光著		印刷中

三民週刊社編
各大書局代售

R
50.5
100.7
1

元旦感言

一九三九年是沉痛的一年，法律秩序已不能統治這個世界，人類道德動搖，國際信義掃地，這一年中，人類正在擴大殘暴的大屠殺，對於祖先幾世幾代積聚而發揚的人類文明橫加摧殘。尤其是在下半年，我們所聽到所看到的都是些生命犧牲，建築物的摧毀，船艦的沉沒，老弱婦孺的輾轉呼號於溝壑，人類的血汗淋漓，繼火而奔去，在思想表現的是兇惡，殘忍，背信，失義和一切道德法律之破壞。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來嗎？人類就這樣沒出息的繼續下去嗎？極度黑暗中是否還有一線光明？

這一年中國際組織更無力，而形同虛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感到戰爭的痛苦組織一國際聯盟，企圖以法律秩序代替刀光劍火。不幸國際聯盟之初美國便不參加，其後所謂國際聯盟實為英法等少數大國所操縱，雖則表面上還以正義相號召，實則祇謀此少數大國的利益，早已不能厭足人類和平之欲望。國際之不能制止義阿戰爭，又不能調解中日糾紛其無力已可概見，世人對之已多絕望。這一年中最要的事是蘇芬開戰，芬蘭之訴諸國際，國際怎樣？徒喚奈何而已。其他比國際小的國際組織，更不能維繫人類之和平。

這一年中慕尼黑協定已因德意志吞併捷克而完全改變了，「歐洲領土之最後的要求」之諾言已被「英雄無信義」之名句所塗改；扶助弱小民族已採用戰爭，和武力威脅之新方式，民主國家與侵略國，獨裁國應修正其定義而為新的解釋（見莫洛托夫演詞）一切條約都可以片面的自由廢止。蘇波互不侵犯協定的履行是蘇聯進軍瓜分波蘭，蘇芬互不侵犯協定的實殘是蘇聯進軍攻打芬蘭，這些條約不是廢紙是什麼？原來國際間以條約來解決紛爭和保證諾言已為幾世幾代所遵守，遵守條約是維持國際信義，這是文明人類必具的條件，片而且耗無

理由即可廢止條約，條約又何須訂定。

這一年來西班牙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中日戰爭仍在繼續，而又掀起了蘇德之對波戰爭，德國對英法之大戰，蘇俄之對芬蘭戰爭。交戰國之生命的毀滅和人類血汗造成之武器的消耗自不必論，各中立國的緊張備戰，糧食統制已使人民不能一飽，中立國船舶不斷的被擊沉使商運不能安妥，全世界物價的暴騰，除軍火商人有利外，全世界都受戰爭的波及而作沉痛悲苦的生活。互相殘殺，等於自殺。這一年來人們已漸漸忘掉第一次世界大戰那種痛苦而加緊自殺的工作而這次的自殺其經濟力量所殺而不死，比砲火直接殺死的更殘忍，這是如何悲痛的事。

在我們的國家，這一年裏，中日戰爭仍在繼續，晉北，鄂西，湘北，贛北，廣東，廣西都有不斷的戰爭，這一年的中日戰爭愈可證明日本無力滅亡中國，中國也無力驅逐日本出於中國領土之外。所曠的問題祇是中日兩國愈加深刻的遭受這戰爭的痛苦。中國大部領土作了戰場，每日都有生命的毀滅，建築的破壞，海口的被封鎖，物價的暴漲，文化事業，經濟，制度都在破壞中。一切的痛苦中國所受最甚，而日本在戰爭和因戰爭統制的經濟下人民所受的痛苦也必不輕。這樣兩國間的問題已明知不能用戰爭解決而仍在繼續忍受戰爭的痛苦，尤為悲慘。

和平運動雖於這一年裏露出曙光，但還沒有成功。在世界，荷比之建議調解歐戰失敗，羅斯福總統不斷的呼籲和平，希特勒已想再度發動和平攻勢，教皇在正在呼籲並建議和平，這些行動表示世界人類仍然不願在戰爭的殘酷黑暗繼續過活，戰爭祇有少數人獲利，祇是各交戰國政府當局的主張，全世界人民都在渴和平。在中日間的情形，日本自近衛聲明以來已正式表明願與中國和平息戰，中國方面全國百姓沒一個不極欲和平，在汪先生領導下正掀起廣大的和平運動。人類的理智如果還有一些清醒時，就應向上，如果不能以殺止殺，如果戰爭不是解決人類糾紛的途徑，應趕快另尋途徑。我們決不願過去一年之沉痛再繼續下去！



南京圖書館藏

622957

共同前進

汪精衛

和平運動所要求的，不是一時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如何纔能得永久的和平呢？中日兩國不但要把兩年有餘以來的戰爭現象，從根本上消滅了，並且要把幾十年以來的糾紛原因，從根本上消滅了，所以中日兩國有把過去嫌隙疑忌的心理，完全肅清，從頭幹起，向着一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的必要。

所謂共同目標是什麼呢？我在「中國與東亞」文中，已經說過，一是廓清百年以來流毒於東亞的殖民地主義，一是要拒絕二十年以來在世界猖獗着尤其在東亞猖獗着的共產主義，這不是指那一個國家，而是指那一種主義。這二種主義向思想上組織上比較弱的民族國家進攻。中國因為積弱，所以被進攻的最利害。日本雖然能自強，但是東亞有一塊地方被進攻，無異日本被進攻。所謂共同防共，即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拒絕，所謂經濟提攜，即是對於殖民地主義的廓清，這是中日兩國的共同目標，為中國，為日本，也為東亞。

中日兩國有了共同目標，便有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了。可如何纔可以向着這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呢？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自由平等，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國的國家民族有了獨立生存自由平等，纔能和日本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然而中國必須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即是中國必須時時刻刻自覺為東亞之一員，中國的安定與和平，必須於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求之。因此中國必須在外交上，在國防上，與日本採取同一方針，在經濟上與日本根據着平等互惠的原則，實行有無相通，短長相補，這樣，東亞的安定與和平纔可獲得，而中國的安定與和平也隨之獲得。所以中國的建國事業與東亞復興事業，是要一致的，如果分離，中國的建國事業不會成功，如果背道而馳，更只有自投於失敗之途。以上是中國必須注意的。同時日本所必須注意的，也想略略的說幾句。日本既然屬望中國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不可不使中

國能充分自由發揮其能力，以期能夠分擔此責任。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對於後進國的援助，是日本應有的責任。可是援助與干涉是有極大分別的。援助是培養其能力之發達，干涉則是摧殘其能力之發達。日本如果採取干涉主義，不但不能啓發中國，自動的願與日本一致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並且會驅使中國與日本分離，甚至背道而馳，日本如屬望中國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

中國的建國事業能與東亞復興事業相一致，日本能援助中國，俾之能完成其建國事業，並俾之能分擔東亞復興的責任，這樣中日兩國便可以向於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了。共產主義雖然猖獗，但是這種絕對的功利思想，與東方的道德精神，終是格格不入的。只要中國能根據三民主義，以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則民生主義實現之日，亦即共產主義在中國完全消滅之日。因為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為主旨，民生主義以社會合作為主旨，這是在根本上的不同，共產主義以絕對的排斥私有財產為目的，民生主義則以根據實業計劃發展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為目的，這是在辦法上的不同，所以

中國如能得到時間以實行民生主義，則共產主義必然絕跡。至於殖民地主義侵入中國，已及百年，根據深蒂固，似非一朝一夕所能廓清。然而最近數十年來，尤其二十餘年來，中國的民族資本已經萌芽，這種民族資本，固然還是很幼稚的，却是培養起來，必然的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的基幹。日本如能與中國的民族資本互相提攜，以先進國的資格，隨時加以援助，則從此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力，亦並非不可能的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都著眼於此的。於此有附帶說明的，所謂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力，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含在裏頭。中國實業計劃的完成，有待於外國資本及技術，這是極顯然的事。這與中日經濟提攜並沒有矛盾。因為中日經濟提攜的結果，中日之間，並無衝突，在這種關係上，歡迎第三國的資本與技術，自然沒有矛盾，而且第三國的正常權益必然因此而得到合理的保障與發達。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是世界的安定與和平之一部分，由東亞的安定與和平，進而為世界的安定與和平，更是世界人類所渴望的事。

二十八年年的結算與二十九年年的展望

林柏生

去年今日，我們有一句恭賀新禧的話：「我們要在二十八年劃一民族鬪爭的新時代。」我們要重整民族鬪爭的陣容，我們要把握國際形勢的推移，我們要樹立復興民族建設新中國的和平勢力，我們以此為鵠的，號召全中國不願亡黨亡國的同志，不願做奴隸的同胞，一致起來，推動民族鬪爭新時代的車輪，猛向前進。

今年今日，檢閱過去，矚目將來，我們心中有說不盡的悲痛，說不盡的熱望。

一年以來，在中日兩國有志之士艱苦支持之下，展開了革命的和平運動，幸而沒有大規模的惡戰，然因蔣中正之作梗，全面的和，未能實現，海南失了，汕頭失了，至於最近，南寧也不旬日而失了。丟了一半以上的土地，曾不足以激發獨裁軍閥之一念，丟了一半以上的人民，曾不足以激發獨裁軍閥之一念。全國南北，還是模糊一片的泛濫着，蔣士和人民的血淚，成千成萬的窮苦大眾，還是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不死於砲火，而死於饑寒，不死於戰爭，而死於游擊隊之洗劫，焦土戰之焚燬與夫抗戰捐棍髮幸外戚之勒索詐斂，這是何等的可哀，何等的凶慘！

在蔣中正的心目中，無國家民族，無和戰大計，只有一種極卑劣的投機心事，以個人的權位，做投機的標準，什麼「越戰越強」「國際形勢，愈見於我有利，」都是這種投機心事充分的表現。一年來的事實在證明獨裁軍閥的抗戰投機

業經因過度的買空賣空而瀕於全部破產了。

他榨取人民的膏血以支持法幣，濫發法幣以支持抗戰，抗戰投機的損虧愈深，法幣膨脹的惡性愈烈，即人民膏血的透支愈大，這種做法，與其說是以人民膏血供養抗戰，毋寧說是以抗戰摧毀人民膏血。以今年六月底與去年同時比較，法幣之惡性膨脹由十七萬萬餘元激增至二十六萬萬餘元，後此數月，無帳可稽，據專家估計，最少亦在三十五萬萬元以上。尤可駭者，膨脹之平均速度，去年為每日一百萬元，今則已在每日三百萬元之間。現金準備，表面上由戰前之六成，今年六月底降至四成四，實則目前已在二成以下，而日趨枯竭。現金完了，拿礦產去抵押借款，拿鐵路權去換取信用，拿桐油，拿茶葉，甚至拿各種農產品廉價的去換取物交易。而變幸外戚還日日利用所謂統制貿易，騙取國內外市價之差額，利用所謂軍事秘密，私受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之軍火扣佣，利用內定之幣價漲落，或放或收，一舉手間，取得賣空買空之盈利，以百萬計。官僚資本，買辦資本，逃亡於香港及國外，一般游資，凍結於上海。變幸外戚把持下之經濟狀況如此，反觀一般平民，則哀鴻遍野，欲求一粥之食一藉之居而不可得。上海工人生活指數，本年一月尚在一五〇之間，九月份已越過一八〇以上，突破十四年以來之長期紀錄，至於內地工農之痛苦，尤屬不勝言，不忍言！膨脹率日以增，購買力日以低，出產日以減，生活日以昂，人民

膏血，剝蝕殆盡，求死之不懈，尙何所恃以抗戰！這是獨裁軍閥抗戰投機，經濟上之破產，

獨裁軍閥有一個特質，是政治矛盾的寄生主義，歷史上奸雄的本色，大率類此。他從來沒有一點明確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行動，從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起，翻來覆去，只是寄生在政治的矛盾上，利用種種政治矛盾，使貪使詐，來造成他個人的權位。北伐以來，綿綿不絕的內戰，蔣記軍閥實不能辭其咎。到了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尤其是二十六年戰事發生以後，這種寄生政策，超越了他可能發展的極點，從此以後，便漸歸於沒落。日暮途窮，還妄冀在政治矛盾中，苟延殘喘。於是乎假藉抗戰，以攘外爲安內的手段，以戰爭爲摧殘異己的毒計，我們從不見蔣中正率領他的部隊收復過一寸的失地，所看見的，只是拿機械化武裝在後面驅迫異己軍隊去前線犧牲，拿直屬部隊去控制湖南，蠶食四川，擾亂雲南，分化廣東，監視廣西；假藉抗戰，卑躬降飾以事共產黨，使共產黨有所用於他而未肯打倒，國民黨有所怯於他而莫敢誰何，左右挾持，藉以自重。這種手法，是他天生的本領，到了今日，越發變本加厲。不但對於別人爲然，對於他的私人，亦復如此，他的賬房，忽而孔，忽而宋，外間總是莫名其妙，惟有在內庭分贓會議竊聽的人纔會明白。他自以爲駕馭異己，苟求偏安，爲計之善，莫過如此。那裏知道，異己軍隊因他的摧殘而怨恨益深，國共兩黨，因他的操縱而摩擦日甚。古今來大奸雄以奸詐之權術而起，亦以奸詐之權術而亡。蔣中正不會例外。以前他在政治的矛盾中寄生，在政治的矛盾中長成，今日他還想在政治的矛盾中

偷活，不久的將來，他必定也在政治的矛盾中送死。這是獨裁軍閥抗戰投機，政治上的破產。

抗戰無勝利之可言，有結束之必要，蔣中正何嘗真不知道，只因爲那卑劣的投機之一念窒塞了他的心頭，所以一誤再誤，至於不可收拾。八一三滬戰發生之前夜，中樞負責諸同志問他，讓戰爭蔓延，有什麼把握，他說道：長江流域，國際關係複雜，與華北不同，上海一戰，必可引起英美各國之干涉。結果呢，只是一場悲痛的幻夢。中蘇締結友好條約，他興高采烈，逢人便說，軍事同盟，即可成立，三個月，蘇俄必定出兵。結果呢，又是一場悲痛的幻夢。滬上苦戰三月，前方將領頻電告急，力陳無可再守，他却調集全國精銳，嚴令死戰，以致犧牲重大，一直退到南京，中樞負責諸同志當時問他，他說，只要守得住三日，九國公約會議一開，美國出頭，日本就要屈服。結果呢，又是一場傷痛的幻夢。張鼓峯事件的時候，他洋洋得意的做共產黨的收音機，說日俄戰爭定要擴大。海南失守的時候，索性說，不但於中國沒有損失，並且刺激英法，共同對日。……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結果呢，無一場不是悲痛的幻夢。向使他稍稍接受勸告，幡然改圖，何至於弄到今日的田地，然而忠言逆耳，他是永遠不會覺悟的，他以個人的權位寄託於幻夢之中，欲以自保，適以自取敗亡，原無足惜，只是，整個國家就此斷送於他個人權位的幻夢之中，却是無可饒恕的。起先他滿心以爲中日戰爭先引起世界戰爭，中國將因此而得救，及至歐戰爆發，纔知道，並不是像陣線論者所預測的那麼一回事。德蘇的妥協，英蘇的決裂，以至最近日蘇間若即若離的談判，

走頭無路，手足失措，從前天大吹大播國際援助，現在無話可講，無可奈何，即得反過來說，什麼自力抗戰，不特外援了，實際上卻又在做着暗盤一機，忽而哀求蘇俄，忽而對日妥協，忽而央請美國出面調停，還派遺密使奔走南北，三番四次的聲言，只要日本以蔣為對手，什麼條件都可接受，只這一句話，其爲了個人權位，不恤喪權辱國，也就可想而見了。抗戰的調子愈高，和平的條件愈低，可謂相映成趣。我們自始就希望蔣能覺悟，接受和平建議，並且希望日本可以以蔣為對手，汪先生在重慶，在河內，在東京，以至於最近，對日本方面，也都是這樣的表示。然而到了今日除了依照汪先生的和平建議與日本直接交涉之外，蔣中正還有講和之可能麼？不可能的。他只有三條路。其一，是跟在蘇俄的尾巴後面去求和。姑勿論日蘇妥協只在對英一點，有其可能，這個妥協是有限度的，在蘇俄不過藉此打擊日英妥協，並且趁火打劫，攫取西北，在日本也不過藉此刺激英美，使之就範，並以此促重慶之崩潰。彼此之間，正所謂同床異夢。就算情勢轉變，其結果必爲蘇俄所利用，而造成瓜分的局面，於是日本在華北，蘇俄在西北，形成對峙，而剩下的西南更將是英法囊中物了。這樣的和平，是承認瓜分，不是和平，中國人民豈能接受，況且虎視眈眈的美國，也不見得會袖手旁觀。其二，是離開蘇俄，在英美支配之下，與日本講和，這麼一來，那「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的共產黨，一定立時立刻翻過臉來，「打倒中途妥協，將逆中止」，「國共立刻分家，重慶立刻崩潰，恐怕和議未成而蔣已坍台了。不久以前，英大使赴渝，奔走調停，爲了共產黨之暗中反對，

蘇俄之單獨行動，終於擱淺，可爲明證。不但此也，如此講和，既非中日兩國作主，而是英美作主，這樣，是否於中國有利，是第一個疑問。是否爲日本所願意接受，是第二個疑問。英國既苦於歐戰，不暇東顧，不能獨力擔當調停，英美之間，對於遠東政策，又各有算盤，能否一致行動，是第三個疑問。老實說，國際調停，如果可能，在歐戰之前，就已經成功，不到今日了。其三，便只有拖的辦法，拖得一日是一日，希望拖到歐戰結束，再來一個華盛頓會議，以國際的壓力，加諸日本，使之息戰言和。蔣中正於無可奈何之中，如此想法，許多英美人士也是日日向蔣注射強力的麻醉劑，教他安心的這麼想法。拖到什麼時候呢？拖到歐戰結束，拖到歐戰問題有了一個總解決以後。但是我們知道，這一次的歐戰是十餘年來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日積月累所造成的結果，除非是整個局勢經過了一場大大的變動，不會隨隨便便可以了結的，目前歐洲正面的壁壘還在宣而不戰的狀態之下，還沒有大規模的作戰行動，英國官方宣佈陸軍損失，只死了一個兵，據說法國方面因戰事所受的損失，比英國還要少些，所以雙方雖然盤馬彎弓，却只是向着中立國放箭，倒霉的是夾在兩大之間的弱小國家，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爲雙方還在佈置陣容，有若干未確定之因素，尙有待於確定之故。這種局面，真不知要拖到什麼時候。就算另有意外，形勢急轉直下，得個暫時間歇，英美各國趁着這個間歇，回轉頭來，爲應付太平洋問題，再開一個華盛頓會議。或者更退一步說，居然拖到歐洲總解決後，那時果然再開一個華盛頓會議，又怎麼樣呢？大家總還記得，第一次大戰，中國加入協約

國方面，滿以為巴黎和會可以得到一些東西，臨到開會，纔知道英日默契，斷送了山東，幾經力爭，始向華盛頓會議輕輕一推，及至華盛頓會議，又以為中日問題在會中可以得到一個合於正義的解決，却被美國多方勸阻，說他們爲要取得日本的同意訂立海軍協定，中日問題，只好在會外直接交涉，爭來爭去，纔有所謂路特四原則，以之爲根據而訂立九國公約，敷衍了事。九國公約不過是白紙上面寫些黑字，沒有一些確保領土主權的效力，是先天注定了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即是再來一個華盛頓會議，中日問題，直接交涉，勢所不免。即使再來一個九國公約，也不過一樣的白紙黑字，又有什麼用處。那時候，國際間曾不會以壓力加諸日本呢？也許會有的。但是，我們又不禁想起了三國干涉遼遼的事。日本是被壓迫了，遼東半島交還了，不過國際壓迫，既非白相可得，也非白相可了，是要有代價的。三國干涉遼遼之後，俄國要旅順大連，德國要膠州灣，英國要九龍威海衛，法國要廣州灣，於是你劃一個勢力範圍，我也劃一個勢力範圍，瓜分危局就是這樣子扮演出來的，從此以後，中國只好在帝國主義的均勢底下過活。帝國主義者相互間勢均力敵，便形似獨立，實則共管，帝國主義者利害衝突，中國身當其衝，便只有徒供犧牲。起初以爲阿甲不好，請教阿乙，阿乙口惠而實不至，又請教阿丙阿丁，請的客愈多，所要預備的酬勞愈大，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總是眼睛看準了你身上的一塊肥肉打算。日本躡在裏頭，想討些便宜，也只得到一點餒餘，還處處碰着勁敵的牽掣，無從發展。中國受了外力的侵凌，不自振奮，却只是求助於人，以爲外力是萬應靈丹

，結果便每況愈下，深深陷入次殖民地的泥犁地獄。百年來全部外交失敗的血淚史，都是由於這種倚賴外力的洋奴劣棍性所造出來的。創痛猶在，還不夠我們反省麼？我們知道，運用外力，本不失爲外交上的一種手段，但必先要自己有了力量，纔說得上運用，否則所運用的，當時似乎是一種幫助，到頭來不過徒然作繭自縛而已。然則蔣能否與日本直接講和，日本能否以蔣爲對手呢？我不說不可能，但不妨分析一下他的方式。旁觀的人，總以爲蔣有實力，別人可以接受的條件，蔣都可以接受，則立刻可以停戰，立刻可以和平，日本又何樂而不爲？不過十六年間的痛苦經驗，日本人士是不會忘記的，蔣倒之後，拿了日本大批的鎗械，大批的款項，得以再起，却一步一步的投靠英美，最後還投入蘇俄的懷抱。與蔣講和，拿來當作苟求停戰，不失爲一個方式，視之爲能解決戰爭，實現永久和平，則相去甚遠。須知道，真正的和平是中國與日本的和平，而不是那一個人那一派別的和平。這裏無所謂那一個人做對手，全要看那一個方式，所得到的和平，可以澈底，而持之永久。至於蔣中正，他的權位如果沒有保證，是不會講和的，從何保證呢，只有倚恃他的靠山主子，不是蘇俄，便是英美，其所以終日夢想國際調停，也就爲此，那麼，走來走去，又還是走上上述一二三幾條絕路罷了。由上所述，第一第二兩個辦法，路不通行，即第三個辦法，也爲我們所不取，我們始終主張以直接交涉爲主，以國際協調爲輔，蔣中正以爲中日戰爭引起世界大戰，殊不知事實上却是因中日戰爭，世界大戰之爆發纔延宕了兩年。列強爲什麼口口聲聲同情中國抗戰呢？很明顯的，以前他們挑

中日戰爭以延宕歐戰之爆發，現在他們玩弄中日戰爭以減少歐戰中之牽制，將來他們也無非是操縱中日戰爭之結果與和平之調處以解決其戰後的困難而已，於日本固然沒有好處，於中國又會有什麼實益？將來局勢，爲利爲害，也許言之過早，只要看看眼前的事實，在蔣中正一個拖字訣之下，爲了討好蘇俄，送了西北，爲了討好英美法，送了貨幣權，礦產權，鐵路權，以及無數大小小權利，今日已經如此，他年更不堪設想了。這是獨裁軍閥抗戰投機，外交上的破產。

本黨同志不忍國家民族亡於獨夫之手，乃集合於汪先生領導之下，去年八月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並聯合全國各黨各派有志之士，共荷艱鉅，建立新軍，以擔負和平反共建國之任務，從此民族獨立的和平勢力有了正確的領導中樞，淪陷區的民衆知道，和平可致，復國可期，因而有風起雲湧之各種組織，支持和平。非淪陷區的將士和民衆知道，無不抗戰，徒然爲共產黨造機會，爲個人作犧牲，因而有連續不斷之反共運動，發自川滇，遍及湘桂，深入西北，自前方將士以至後方民衆，翹首以待和平運動之開展。海外民衆也漸漸知道，御用機關所公佈之戰事消息，諱敗爲勝全屬欺騙，因而有紐約，舊金山，香港，新加坡，各地之抗捐運動，抵制國民宣誓運動，以及清查救國捐運動。一年以前，雖然有人誤信主和的就是漢奸，如今大家都在討論和平與獨立，雖然有人誤信蔣中正有辦法，不能戰而勝利，還可拖而僵持，如今大家都在搖頭太息，急於從和平中謀一生路了，一年以前，還有人爲共產黨所迷惑，蘇俄

視爲救星，如今蘇俄風分波蘭，再侵芬蘭，侵略者之猙獰面目畢露，共產黨之技術已窮，再沒有人肯相信它了。凡此種種，都是和平勢力日形擴展深入民心的表證，到了今日，但是全中國不願亡黨亡國之同志，不願做奴隸的同胞先後集中於民族獨立運動的旗幟之下，爲中國的獨立而奮鬥，爲東亞的和平而努力，即在日本，謀國者亦表示放棄侵略主義之決心期與獨立自由之中國攜手共進，分擔安定東亞建設東亞之責任，而得到廣大民衆之支持。

所以二十八年的總結算，所看見的，一方面是舊勢力的總崩潰，一方面是新勢力的勃興，這新興的勢力便是中國民族獨立的和平勢力。

二十八年是中國民族獨立的和平勢力之發展時期，二十九年將是中國民族獨立的和平勢力之擴展時期，這擴展將由統一中國而實現全面的和平，由全面的和平而確立中國之獨立自由，更由中國的和平勢力與日本的和平勢力結合而成東亞的和平勢力，由此而樹立東亞永久之和平與秩序。

我們不斷的說過，目前普遍全國的和平運動是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也就是中國民族獨立戰爭的一個重要階段。我們不但要和平，尤其要在和平奮鬥中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我們不但要中日兩國休戰言和，尤其要休戰言和之後，確立了兩國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我們必須一方面使和平的要求與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一致，一方面使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與中日兩國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要求一致，這樣，我們所做到的和平纔是合於正義的和平，纔可以適應中國國民的需要，並且適應日本國民的需要，反之，要是和平而正

能適應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則在中國為不合理，要是和平而不能使中國與日本分擔安定東亞建設東亞的責任，則在日本為無意義。片面的和，不平的和，斷非中日兩國所能共同接受的。我們知道，在和平運動中，我們必然遭遇着國際擾亂勢力的破壞，遭遇着國際侵略主義的打擊，遭遇着一切舊勢力的阻撓，這種工作必然是困難的。不能無挫折的。惟其如此，所以因利乘便，苟求和平，為我們所不取。有些人看見新政府遲遲未成立，心裏不安，這不是看得組府問題太重，便是看得組府問題太輕。為什麼說是看得太重呢？他們以為和平運動的目的就是組府。為什麼說是看得太輕呢？他們以為大家上台，政府成立，和平便實現了。殊不知組府是從運動的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和平運動的根本目的，在於從和平奮鬥中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確立中日兩國永久合作的基礎，基礎的條件具備了，組府問題，便是水到渠成了，然而組府之後，還要有不斷的奮鬥，不斷的努力的，和平條件之當否，不是看那一個人可以接受，而要看中國能否接受，中日兩國能否實行，汪先生則是整個中國的代表。我們決不願意隨便披了和平的外衣，便以為是和平實現。和平運動所克服的困難愈多，則和平的條件愈真實而其基礎亦愈鞏固，今日的困難愈多，後來的困難愈少。所以我們所受的挫折愈大，而前進的勇敢愈增。汪先生離渝之前，苦苦的忠告蔣中正，「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蔣塔然的說，「抗戰難，和平更難，」蔣是知其難而避難就易，而貪圖偏安，汪先生是知其難而又深知其必要，所以挺身而起，不避艱險，率領同志，以與一切困

難奮鬥。在兩年有餘的苦戰中，中日兩國人民，流了無數的鮮血，這鮮血是為中國的獨立自由，為東亞的永久和平而流的，我們不能讓人民的鮮血白流，我們要將這些血染成中國獨立自由的國旗，鑄成東亞光明燦爛的一座和平燈塔。

日本是戰勝國，中國是戰敗國，以戰敗國與戰勝國講和平，怎樣纔能夠合於正義，怎樣纔能夠適應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而又適應中日兩國共同生存共同發展的要求，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並非不可能的事，在理論上，在實際上，不但可能，並且是應有的必然的趨勢。為什麼呢？

第一，中日關係，遠的不必說，近數十年來，有過無數的糾紛，日積月累纔演變而為此次戰爭，如果兩年來的血戰是過去糾紛的總結算，則此次和平應該是今後關係的新起點，所以中日兩國和平以後的新關係不但要適應日本國民的需要，並且要適應中國國民的需要，兩得其中而共享其利，如古人所說，交相利，兼相愛。要不然，虛偽的和平的結果，只在中日糾紛中平添了一頁黯然而無光的血淚史，和平的基礎未立，戰爭的原因已種，中日百年大計，從何說起！

第二，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淪為次殖民地，於茲百年，中國民衆，奮起革命，前仆後繼，無非欲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而自躋於獨立國家之列。如果日本以戰勝國自居而視中國為其利所得之殖民地，那麼，在中國始終認定日本還不曾放棄侵略主義，喘息之餘，臥薪嘗膽，雪恥復仇，理有固然，勢所必至，在歐美，更認定日本為戰為和，無非欲化中國為其獨佔之殖民地，利害衝突，權益爭奪，無可倖免，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日本與歐美的衝突，不過侵略

者羣相互間之爭奪，同是一邱之貉，使歐美此時稍示同感，則中國縱未得其實力相助，而中國人民感情之所寄，必將重於此而輕於彼。本黨總理孫先生會力言中日合作之必要，二十年來中日兩國本有不少接近機緣，而終至背道而馳者，此種形勢，爲之作梗，實其一大原因。撫今追昔，不禁愴然！中日兩國國民不欲爲百年計着想則已，否則痛定思痛，實有深切反省之必要。日本雖勝，國力雖強，然侵略主義一日不放棄，則對華有堅強之反抗，對歐美有劇烈之競爭，孤立之勢，顯而易見。不平之和，固無益於中國，又何裨於日本？反過來說，日本能以兄弟之邦視中國，以獨立自由之國家待中國，那麼，中國人民從此認識，日本不但沒有滅亡中國的心事，且進而援助中國以求國家之獨立自由，更深切認識，致中國於次殖民地使之不自由不獨立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援助中國以求解放的是日本，爲敵爲友，可立而決。如此則中國人民不復有疑懼日本的心事，且樂與之親近以謀兩國之共存共榮，以排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勢力，以樹立東亞之永久和平，可以斷言。兩相比較，利害判然，何去何從，是不待煩言的了。

第三，日本以分擔安定東亞建設東亞之責任期望中國，中國亦以自期，唯其然也，所以不得不努力充實分擔這責任的能力，努力造成分擔這責任的環境，其決條件便是中國的獨立自由。如果中國還不能得到獨立自由，如果中國還是國際侵略主義控制下的次殖民地，那麼，到處受着侵略主義的干涉和牽制，那裏還能夠分擔這個責任呢？這一點，十三年間，孫先生在神戶演講，就已經說過，「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的均沾的條約，中國現在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

由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日日反要來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他的朋友乙去喫飯，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舉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喫飯。日本要來和我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上，不遇到中國的第一個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個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那些主人，便要和他們舉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喫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是自由的身份，中國纔可以同日本來親善。」這就就環境而言，中國已沒有自由和日本接近，那裏還說得到充實力量，和日本分擔東亞的責任呢？

第四，許多人疑懼經濟提攜，以爲日本在別的地方可以讓中國獨立自由，在經濟方面，一定要控制，這種疑慮，不是無緣無故的。日本於戰敗之後講和，不能無所得，中國於戰敗之後講和，不能無所失，是人情之常。然而中國所得的愈多，中國欲其所失的愈少，也是人情之常。然而中國之所欲，不能逾乎主權獨立之最低限度，日本之所得也絕非可以求之控制之中。年來淪陷區的產業經營，因軍事佔領之故，悉在控制之中，如果可行，行之而有利，日本也不必改弦易轍，倡言經濟提攜了。須知道，在控制之下，中日經濟形態，只是一種原始的剝削關係，而非共同發展的關係。就算日本資本在原始的剝削關係中，起先可以得到一些便宜，但其結果，一要引起日本資本與中國工農間的衝突，二要引起日本資本與中國民族資本的衝突，三要引起日本資本與在華資本的衝突，四要引起日本資本與歐美資本的衝突。這麼一來，一方面中日兩國的經濟力量，不但不能謀共同之發展

，並且逐漸消耗於種種衝突之中，今後在中國的產業，無論是中日合資經營的，或是中國獨力經營的，只有瀕於破產，中國固然蒙莫大的損失，日本也是得不償失的，他方面，既不能厚集中日兩國的力量以與歐美資本對抗，反足予歐美資本乘間抵隙，伸張勢力，使中國的資本更加買辦資本化，更加增強其對美資本的倚賴。戰事以來，中國土著資本逃亡於上海，就是一個顯著的明證。再舉兩事，以為說明。例如幣制，這是經濟的中心問題，或者以為日本必定要求中國，加入日元體系，藉此以控制中國全部金融，我們的看法，却不盡然。中日兩國既然要經濟合作，則兩國貨幣依於經濟的自然法則，有正常的聯繫，是必然的，行之得當，於日本有利於中國也有利，反之，於中國有害，於日本也有害的。須知道，貨幣集團之構成。最最主要的是它的實力基礎，所謂實力基礎要將其所由構成的因素，通盤打算。英法的貨幣聯繫，他們各有獨立自主的力量，所以互相幫助，互得其利。要是中國的貨幣沒有獨立自由的力量，勉強置於日本的貨幣控制之下，而為其附庸，那麼，為了對抗歐美貨幣的力量，與其說，日本因得到中國貨幣之聯繫而加增其實力，毋寧說，日本因掌握中國貨幣之控制而加重其負擔。這一點，凡是究心經濟原理，貨幣戰略的人，總會明白的。所以為中國打算，中國有確立獨立自主之幣制而與日本為正常之聯繫之必要，為日本打算，為整個東亞打算，日本也有協助中國確立獨立自主之幣制而取得正常之聯繫之必要。又如農業，言其大者，且說棉花，假定日本第一步控制中國的棉花生產，第二步控制中國的棉花銷售，以低於國際市場，甚至低於成本的價格，供應日本棉織業之所需，似乎是絕對有利的了。其實不然，棉織業之發展，不但要有廉價的原料，並且要有廣大的市場，所以現在代合理化的經營方法，必須改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生活，增進他們的生產力，同時提高他們的購

買力。在棉織業上，農民是原料的生產者，又是商品的消費者。原始剝削的產銷獨佔，使一般農民瀕於破產，既摧毀了他們的生產力，又摧毀了他們的購買力，生產也降低了，市場也縮小了，還說得上什麼發展呢？原始剝削，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自是原始資本積累的一條主要槓桿，却已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桎梏了。試看看南美洲的歷史，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在那裏憑着原始的剝削，為大規模的種植，何嘗不盛極一時，曾幾何時，美國獨立，資本主義到了較高一度的發展，南美諸國，先後獨立，由西葡控制之下，轉移而落於盎格魯薩遜民族的掌握中，特別是對美國的聯繫。以上兩例貨幣控制，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金融資本的方式，農業控制則很容易走上原始剝削的舊路。歐美資本主義早已進至金融資本的階段了，我們東亞，中國不說，就算日本，也還在半途之中，原始剝削則開倒車，覆轍可鑒，金融獨佔則起時代，力有未逮。舉此兩端，可概其餘。我們今日，必須從根本着想，從大處遠處着想，我們必須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謀中日兩國經濟力量之發展，並以謀中日兩國經濟力量之結合。

由此四點，我敢決言，中日兩國的真正和平，必須是合於正義的和平，必須適應中國國民的需要，同時適應日本國民的需要，想來，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必能抱遠大的眼光，本交相利兼相愛的精神，為中國打算，為日本打算，同時為整個東亞打算的。

最後。我們以滿腔熱誠提出下面的兩句口號，為全國同胞，為中日兩大民族，恭賀新禧：

樹立民族獨立的和平勢力，實現和平統一！
中日兩國的和平勢力聯合起來，保障東亞永久的和平！

二十九年元旦

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

周化人

大亞洲主義是 總理孫先生最後的一次講演，也就是他學生奮鬥的目的及祈求其實現的理想，無疑的這是孫先生最後的政治主張，和遺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了。我們研究 總理遺教，亦當以此為最終論定的。這一個政治主張，不特為東亞中日兩國人士所歡迎，而且為亞洲的民族所歡迎，這是孫先生思想的偉大，這種偉大的思想，是導源於中國古代哲學的。如「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等，都是中國歷代傳統的國粹，而為孫先生平日所服膺的。「博愛」二字是孫先生平日喜歡書以贈同志的，博愛的精神，就是墨子「兼愛」的精神，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盜愛其寶，不愛其異寶，故竊異寶以利其寶。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視人之寶若其寶，誰竊？視人自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這是墨子的兼愛哲學，孫先生平日所主張的博愛，是與此說相同的。因為孫先生愛中國，所以他數十年如一日的獻身革命，以挽救中國的危亡。同時，他亦愛亞洲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主張聯合起來，以解除其束縛，使亞洲的有色人種，俱獲得自由。這種「已飢已溺」的博愛精神，是中國寶貴的傳統。孫先生繼承這種傳統，闡發而為大亞洲主義，還是很顯明的。

「和平」是孫先生的最後遺言，也是中國古代哲學一個重要的傳述。例如老子的人生哲學即有下列的記載：「江海所以能為百各王者

，以善下之，故能為百各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天下莫過於水，而攻堅勝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這便是老子濡弱謙下的「和平主義」。他深知武力的競爭，以暴禦暴，只有更烈，決沒有止境，只有消極的軟工夫，可以抵抗殘暴，狂風吹不斷柳絲，齒落而舌長存，又如最柔弱的水可以衝開山石，鑿成江河。人類交際，也是如此。這種不爭的和平美德，經過數千年的淘漚，遂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種軌範，而形成為今日國民的意識形態。所以孫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說：「中國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好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公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孫先生的和平思想是脫胎於古代哲學及民族的和平精神的。他激賞和平為民族的原動力，欲以和平精神來恢復中華民族的固有地

位，更欲以和平精神來恢復亞洲民族的固有地位。所以和平為大亞洲主義的要素。

說到「仁義」二字，則為中國特有的政治哲學。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凡是施行仁政的，其國必治，反之則亂。這可說是已經形成的鐵則，故中國歷代先哲對於仁義之提倡，不遺餘力。其最著者則為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百乘之家，弑其君者，必數十家，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未有仁而違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告子篇下「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聽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太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這樣子提倡仁義為政治教化之本，不特後世奉為準則，而且成為習俗，「居仁由義」「據德依仁」的教條，普遍於民間，這種文化，是我國特有的精神，所以孫先生說：「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

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玉道的文化。」由此可知孫先生所說的大亞洲主義，就是這種玉道的精神。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和歷代先哲所說的仁義之說以一貫的。

「道德」是中國素來尊崇的。論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孔子又說：「夫道者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非道德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臣，不以其道服治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遵師旅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這是孔子是政治哲學。孔子是主張以德治天下的，所以他說：「上敬者，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事。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主信，民敦俗樸，男懿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窮，納諸尋常之室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怠惡，如湯之灑雪焉。這是他主張德治的具體辦法。中國歷代的帝王，常有遵守這種教條而獲得政治的。並且經過先哲的闡發提倡，把道德觀念變成為社會上不成文的法律。於是道德成為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國家行政的根據，其裁制力是超乎有形的法律，無形的神權以上的。說德既為個人的最高理想，政治的無上極則，怎樣可以養成這種德行呢？大學上說：「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一段修業進德的方法，是很完備的。他把「修身」作為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這樣便把個人的道德和政治的行為聯繫起來，所以孫先生說：「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的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是屬於道德範圍的。」孫先生推崇這種理論，以道德為政治哲學的基礎，無疑的，他是繼承這種學說，主張以道德來治國平天下，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自然他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也是以道德為基礎的。所以他說：「要建設大亞洲主義，究竟應該以甚麼為基礎呢？我們應當以我們固有的文化為基礎，即講究仁義道德，仁義道德即大亞洲主義的最好基礎。」由此可徵大亞洲主義，是仁義道德的結晶，和我們的古代政治哲學，是一脈相承的。

以上徵引古代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的學說，都是孫先生講述三民主義及大亞洲主義時常常提到的論證。由於這種仁義道德博愛和平學說的傳播，遂交織成東方文化的特徵。這種特徵，就是「王道」的精神，我們東亞的民族孕育於這種王道的文化生活中，已經數千年了。——例如自百五年前至二千年前，其間相隔有一千餘年，中國是世界的強國，就國家的地位，猶如今日的英美，英美現在雖然強盛，但亦不過列強而已。當時中國的強却是獨強，中國在這種獨強的時代，對於其他弱小國家與民族是怎樣的呢？當時各弱小民族與國家，均奉中國為上國，以中國朝貢為榮，而認為不能來中國朝貢為恥，當時到中國來朝貢的，不單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亦轉地自遠方趕來。可是當時中國究竟用甚麼方法使許多國家和遠方民族肯來進貢呢？用海陸軍行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嗎？不是的，中國乃完全以王道感化他們，他們對中國懷德之餘，都自願前來進貢。他們一度受王道的感化，不僅前來朝貢一次，而是子子孫孫都來朝貢的。」（大亞洲主義）

義——我們的祖先對於王道的精神，可謂發揮盡致，實行盡力了，中國以前雖處極強盛的時代，亦不以其武力加諸弱小民族的身上，從沒有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來滅亡其他弱小的國家。這種光榮的歷史傳統，是孫先生贊賞不置的，我並繼承這種歷史的傳統，發揮東方的王道精神，貫徹這種王道精神而求其實現的，則為他所說的大亞洲主義。

孫先生講述「大亞洲主義」時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當時的國際形勢怎麼樣？那正是第一次歐戰結束不久，資本主義列強瘡痍滿地，正在設法補償及謀恢復的時候。自然列強的眼光會注視到亞洲這一塊大地上來。那時亞洲的獨立國家，東亞只有一個日本，西亞只有一個土耳其，中國則在列強資本主義侵略之下，日在紛亂掙扎之中，怎不令孫先生為亞洲焦急，為中國焦急！孫先生為謀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所以提倡三民主義。為謀亞洲的獨立自由平等，所以提倡大亞洲主義，三民主義的目的是救中國，大亞洲主義的目的是救亞洲，這兩個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因為西方的利己主義，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以來，日逐膨脹，帝國主義的侵略，隨着軍事政治的力量而俱來，東方落後的民族，遂逐漸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亞洲雖大，已無一片乾淨之土，在經濟政治侵略下的亞洲，可以說有色人種，已變為白種人的奴隸，在帝國主義者的心目中，「近東」與「遠東」，亦不過非洲第二耳，在其砲艦政策控制之下，黃種不難俯首帖耳地屈服的。不料日本維新，發憤自強，日俄戰爭，竟把俄國打得一敗塗地。這是出乎白種人意料之外的。所以孫先生說：「日俄戰爭，結果是日俄打勝了俄國，這是近幾百年來亞洲民族第一次戰勝歐洲人，全亞洲的民族更蓬勃地產生了一大希望。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所以才敢告訴諸君。日俄戰爭開始的一年，我正在歐亞。某日聽見東鄉大將擊破俄國海軍，俄國新成立的海參威艦隊，自歐洲開往日本海的途中，全艦隊悉皆覆滅。這消息傳到歐洲時，全歐人民竟悲痛得如喪考妣。那時英國雖和日本同盟，但聞訊之後，也感覺到異常不安。因為他們認為日本人得此大勝仗，結局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比水濃的觀念。嗣後不久，我自歐洲趁船歸亞洲。通過蘇俄土運河的時候，來了許多土人，多數是阿剌伯人，他們一看見我是黃種人，均現歡喜之色，「你是日本人嗎？」

立批其立亞，
 強評有平洲以
 化：連等主求上
 一環，義中述
 並孫性所，國兩
 全文的以以之個
 亞的。三求獨原
 細民日民全立則
 亞生人主亞平的
 民哲河義洲等範
 族學野的的，爾
 的之密國獨同雖
 復出民民立時有
 興現現革平不不
 而於於命等能同
 而民三與，忘，
 透族民大同記但
 通主主亞時亞精
 種義義洲，洲神
 大上與主亦諸是
 亞，大義不國一
 細將亞的能的貫
 亞成洲民忘獨的
 主爲主族記立，
 義中義獨中平實
 以國會立國等行
 達民作運本；三
 到族這動身實民
 大的樣，的行主
 獨的是獨大義

挽化叫的國地是民，至強而，平
 救各做奴的。中地其今幾爲東遂仁
 中方一隸殖凡國還實還十列方蔚義中
 國面次。民是究要中只年強的成道國
 ，的殖故地和竟利國知經的王爲德是
 三侵民叫，中是害所道濟半道東等亞
 民略地中是國那，受列力殖文方哲洲
 主，一國做有一比強強的民化的學的
 義已。做各條國方了的壓地，王，一
 ，經一半國約的安列半迫。遂道都部
 就是民殖的殖南強殖，所爲文是份
 是危族民殖國民是經民弄以洋化發，
 中亡主地民家地法濟地到孫槍。生而
 國無義，地，呢國力，中先大但於且
 革日第是，都？的的這國生砲近中是
 命了二很我是是殖壓半各很所百國
 的，講不們中對民迫殖地概推年古洲
 指所一對不國於地，民變然毀來代文
 導以中的只的已，不地成的，的化
 原孫國。做主經安只的了說中西，發
 則先受依一人締南是名列：國方經源
 。生了我國，結人半詞強一隨的過的
 提列定的所了做殖，的中着功數國
 倡強一奴以條法民是殖國亞利下家
 以的個隸中約國地自民已洲主年，
 三政名，國各的，已地經的義的舉
 民治詞是不國奴比安。受命日淘凡
 主經，做只的隸較耐全過運逐養博
 義濟應各做殖。全自國了，東蘭愛
 來文該國一民但殖己人列降漸發和

導之族。族族實二結，人起過因是責？
 原下，即始思，十果日的頭去此日幹一
 則解都可能想印年，本戰來我看本？他
 。放要以攜的度，使的勝。們得職一們
 出得明手最的然亞打也這東見滅經勿
 來到白，進獨而洲敗就次方每了我奴
 。獨係全步立埃民俄是日有一俄那地
 孫立先亞，運及族國他本色隻國麼問
 先自生民此動的產，們打民滿自一我
 生由的族種也獨生豈的敗族戰歐問。
 的與大的進在立了非戰了，俄洲，一
 大平亞獨步與早獨影勝俄都國開才不
 亞等洲立思日已立憲，國受湯去知是
 洲，主運想俱成的到他們，西兵的道
 的主要義動的進了大頭們也方駛艦他，
 義的始發，事希洲當是民回隊們我
 ，到實能達此實望全然東族歐時已是
 就這贊成，種，民感方的洲浩聽中
 是個與功達獨士這族到民壓的息到國
 全目內。到立身種嗎愉族迫船。了人
 亞的容一極的其希？快打，他非，
 洲，了我點事的望：和敢飽一們常諸
 民就，們之實完的：興了受定住愉位
 族要他讀後，全產日奮西痛是在快這
 獨從要了，係獨生本了方苦俄運的樣
 立白全這全表立迄戰。民，國河消高
 運種亞一亞示也今勝這族但戰的息興
 動人洲段洲亞成亦俄樣，却敗兩，
 的鷓的說的洲了不國看日拾了旁那有
 指斃民話民民事過的來本不。就何

代洲平復大是來益，亞亞理無兩能之國國現不，言
 的仁與亞從的加歐洲洲想可國保兄人之在斷不日
 同義穩洲痛中緊美的主，疑互持弟所保，然惟：仰
 胞道有主苦日，對共義如者爲其也熱育則排應一
 們德希義經戰在亞同的宮。提和，心，見去當亞
 ，的望，驗爭這洲目健崎一攜平假期而維之除細
 我偉，中中，種的標者實所，使待與持也去亞
 們大東日得已環經，。藏以則日此者中之。猜者
 要精方和到的體境濟道故，大不本雙也國實亞疑，
 聯神文平的驗之侵種可以養洲東亞之亞科，亞而亞
 合，化穩能理成，相中日的，，和，爲也細之且細
 起穩理功，攻日漸目大，，，，，，，，，，，，，，，，
 來能想功，後即兩加標亞頭不平強有吾之，信之亞他亞
 實於想功，後即兩加標亞頭不平強有吾之，信之亞他亞
 現甘能亞東兩國深，洲山特，之相人是責亞他亞
 大世達洲亞兩國深，洲山特，之相人是責亞他亞
 洲的諸國傷還三都是及國界中事，一重有，中
 主義，先立應，不國要中，小人之國，日人大，保五
 ，文化們主激底能帶現，的，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造史遺總底能帶現，的，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成上給能帶現，的，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亞放我現，的，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一異博亞有
 個彩博亞有
 新。博亞有

來益，亞亞理無兩能之國國現不，言
 的加歐洲洲想可國保兄人之在斷不日
 中緊美的主，疑互持弟所保，然惟：仰
 對共義如者爲其也熱育則排應一
 戰在亞同的宮。提和，心，見去當亞
 這洲目健崎一攜平假期而維之除細
 種的標者實所，使待與持也去亞
 已環經，。藏以則日此者中之。猜者
 體境濟道故，大不本雙也國實亞疑，
 驗之侵種可以養洲東亞之亞科，亞而亞
 到路共以養洲東亞之亞科，亞而亞
 相中日的，，和，爲也細之且細
 攻日漸目大，，，，，，，，，，，，，，，，
 後即兩加標亞頭不平強有吾之，信之亞他亞
 洲山特，之相人是責亞他亞
 洲山特，之相人是責亞他亞
 國界中事，一重有，中
 小人之國，日人大，保五
 的和平東亞，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亦容大之一，則亦本，一爲力

信，生溺他們辭新立理來的亞化的
 仰亞蘭一民一下中刻想的道細中世界
 大洲述一族方的國消的民義亞國民主
 洲爲大痛的面亞，除大生的內族義
 亞亞亞康平實細由嗎亞哲精復族義
 主洲洲在等行亞善？細學神興，。
 義人主抱，三諸隣我亞思，，以他的
 的義一這，民國敦們主想，民這威的
 一亞，的種主，陸義以的說，似乎存
 人洲完襟理，實政策，孫文回顧中一
 在，由，，以現求亞謀胸中一下三
 的甘種而是求亞謀胸中一下三
 大種理廣中平細亞細所描寫的主義
 亞理想之國等亞細亞，同義的復理
 亞不出就代時。復興與
 主難發是哲實一興與
 義達的大學行他，則
 論到。亞的理大道並，是許
 一。如洲理亞種想解多，想
 書日果主想洲觀解多，想
 中亞義，洲觀解多，想
 述寺各精請一，對白種強豈不
 孫謙國神一，對白種強豈不
 先吉覺。已以的種強豈不
 生氏悟孫飢求。人盛不文洋理實
 之是到先已其我羈的能之古想現強

一九三九年耶誕

中國共產黨問題

胡蘭成

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抗戰的發動者，也不是抗戰的支持者。至今蔣介石政權依賴的是英國，不是蘇俄，而支配中國的，則是蔣介石政權，不是共產黨政權。

抗戰的發動，是因為蔣介石履行西安事變時與共產黨訂的密約嗎？絕不如此。政治鬥爭，是取決於勢力的對比，並非取決於什麼信義的。經過西安事變，國共的勢力對比還是沒有變化，沒有東西可以使蔣介石對共產黨遵守諾言的。我們只要看看中世紀英國和德國的農民暴動，一直逼到了皇帝的宮殿，他們的要求都被批准了，然而他們一走開，便什麼都推翻，隨來的是以大规模的屠殺來鎮壓暴動。所謂鬥爭，就是如此的。何況西安事變，連這樣浩大的聲勢都沒有，只是一幕兵變，只是危及了蔣介石個人，並沒有撼動蔣介石政權的基礎。共產黨和一些軍閥，只是因為殺死他不是辦法，軟禁他也不是辦法，想來想去想不通，纔放了他的。而所謂密約，則在共產黨自己，也原來不過是拿它來解嘲而已，沒有認真希望過蔣介石會踐約的。

那麼，究竟是怎樣抗戰了起來的呢？原來這些年來中國的外交，總是聽命於英國的，這個可以說是道歸一尊，和北伐以前軍閥的各事其主比較——其間可以看出一個顯著的演變。這演變的過程，是經過

無數次國內的與國際的鬥爭的，那就是北伐後的一長串內戰，與英日美的衝突。這樣鬥爭，在施行法幣政策之際總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可是，中國的統一，是只能由革命來達到，不能由外力的支配來達到的，而連東的均勢，是只能由中國的獨立自主來做它的支點，不能拿中國做某一帝國主義的工具來維持的。因為是這樣，所以法幣政策實施以後，中國對英國的依賴雖然做到了道歸一尊，然而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的對立迄未消滅，而且以抗日為名，強化了衝突。其在國際關係上，則英美之間的吃醋反而加甚，英日之間的衝突反而加深。這樣子，地方與中央的對立，和英日之間的衝突配合起來，再加上美國因為吃醋的緣故不肯調停，就爆發了這次的中日戰爭。

當時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還歷歷如在眼前。一面是地方軍閥在那裏大膽抗日，另一邊是英日在倫敦談判中國問題，蔣介石政權既不能以革命的力量來統一地方軍閥，壓倒冒牌的革命，便只能手足無措，心慌意亂的被一陣盲目的潮流拖了去，何況英國拿不出主意，蔣介石政權又不敢自作主張來解決中日問題，所謂抗戰的決策，就是從這種無可奈何的被動心境中產生來的。這種無可奈何與被動，達到什麼程度呢？可以拿兩樁事實來說明。一樁是倫敦談判，一樁是蔣介石

在廬山的演說。英日倫敦於六月底成了僵局，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可是英國對付倫敦談判的僵局，還在請求美國轉圜，因而蔣介石對付七七事變，其給宋哲元的命令是：不讓步，不刺激，以此來適應英國的轉圜步調。等到七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對新聞記者宣佈不擬幫忙英國轉圜，英國於七月廿六日對日本正式表示倫敦談判決裂，這樣子，蔣介石對付八月十三日的上海戰爭，也就表示十分決絕了。這完全是殖民地的作風，難怪蔣介石之徒聽到『中國是爲了英國而戰』，會覺得十分欣慰的。

講到蔣介石在廬山的強硬演說，那更是笑話。他爲什麼要發表這樣強硬的演說呢？或者他以為可以嚇退日本，但更主要的，却是借此來敷衍當時一批地方軍閥，共產黨，以及七君子之流的抗戰要求。假使是一個革命的政權，對於這種借抗戰做招牌與浮囂的左傾幼稚病，應當是可以拿出堅定的路線來打消的。又假使僅僅是一個統一的政權，也可以用強力來打消的。可是蔣介石政權兩者都辦不到。何況英國出不得主意，蔣介石自然變得慌亂失措，哭笑無常了。剛在廬山發表強硬演說之前——蔣介石還在南京軍校演說，痛哭流涕過的，說是中國決不能與日本作戰，在他是只有悲痛，只有慚愧，如此云云。剛在廬山的強硬演說發表之後，蔣派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來滬，召集新聞記者訓話，說是對於委員長的演說不可作機械的解釋，目前以鎮靜人心爲第一，如此云云，這裏十足的表現出蔣對於國內諸政治勢力，

是不肯領導，也不能統治，而只有迎合，迎合是出於無奈，又想要點槍花來轉圜，而終於轉圜不了，這是可悲的。

中日戰爭就是這樣子在蔣政權對英國的依賴及其迎合國內諸政治勢力的雙重低能作風之下爆發，擴大，並且延長到如今。

中國共產黨的罪惡在那裏呢？過去廣州暴動及在江西的軍事冒險，企圖在山上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已經受到過無數次革命的理論的駁斥，並且受到過嚴格的事實失敗的教訓，這裏姑且不必再說。單說西安事變，一批左傾青年，對於蘇俄命令釋放蔣介石表示不滿，把它看成失敗，後來看見蔣介石抗戰了，同一批左傾青年又高興了起來，以爲西安事變的確處理得當，勝利了。事實上，西安事變是中共失敗中之失敗，問題倒不在於釋蔣或殺蔣，而是在於中共把社會主義的革命訴之於宮庭政變。宮庭政變不但不能改變階級的政治勢力的現狀，而且只有使階級鬥爭的陣地更加模糊。軍事冒險主義失敗之餘，更墮落到宮庭政變的恐怖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不見了。蔣的抗戰如前面所說是另有原因的，並非由於他遵守西安事變的約束，而中共竟以蔣的抗戰爲西安事變的光榮的結果，這是中共的至死不悟。

革命者對於中日問題的處理應當是：在戰爭前夕儘可能的避免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後儘可能的把抗戰與民族革命結合，在戰爭失敗後更要懂得如何收拾僵局。可是中共的幹法完全相反。

無論抗戰是怎樣革命的——可是條件沒有具備的時候是不能盲動

的。在十月革命前夕三四個月，列寧的教條是，把武裝暴動減到武裝遊行，把武裝遊行減到普通的示威遊行，以此分頭對羣衆解釋，要求他們瞭解羽毛未豐，不能輕於一擲，中共就不然。有一盒火柴就要命令暴動的，對這次抗戰也是如此。當時蔣介石方面的說法是：準備抗戰。中共因爲提不出它自己的準備抗戰的方案，乃以「即刻抗戰」的口號來對抗，在這上頭，就十足的表現了中共的貧乏。中共之外，第四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亦即托派，當時提的也是這個口號。後來我在香港遇見一托派的負責人，我就對他說起「即刻抗戰」這個口號，即從共產主義的鬥爭藝術來看，也是不正確的。他說當時托洛斯基也批評過這個口號太機械，但是這個口號仍然被中國的托派沿用了。

抗戰起來之後，中共的口號便是：「擁護政府，服從領袖，抗戰到底。」對於蔣介石的依賴英國以戰，對於蔣介石的利用抗戰以爲軍事獨裁，中共用「統一對外」的口號替蔣介石推波助瀾，彈壓革命的鬥爭。抗戰起來之後，民衆運動會一度有抬頭之勢，向來禁止的書籍刊物也曾一度公開流行，但這不是中共的力量爭取得到的，中共的工作，倒是在幫助蔣介石虐害民衆運動的生機，不能剷除的，就把它變爲啦啦隊。這樣子，民衆的革命力量很快的就夭折了，甚至於連啦啦隊都往往做得不討好，在武漢的時候蔣介石就可以封閉新華日報。可見，中共的力量却確實因抗戰而增大了不少，但只有軍閥政客的意思。至於托派，在這其間，倒是在對於蔣介石的依賴英國以戰與利用抗戰以爲軍事獨裁，不斷的批評，不斷的鬥爭的。

到了日本願和，中國也實在戰不下去了，和議已爲必然的時候，蔣介石因爲依賴英美，不敢作主，反對和議，固無足怪，中共也在那

裏強調無底抗戰，纔更無恥。關於這一點，我也和上述的托派負責人討論過。他們也是反對和議的，但不像中共那樣以爲抗戰現狀可以持久並且得到勝利，而且認爲和議之爲必然的趨勢。那末他們爲什麼也反對和議呢？理由是，抗戰如果坍了下來，隨來的將即刻是極右派的大反動，革命勢力將遭到更大的打擊。他還這樣說：蔣不能和，汪不配和，無產階級又拾不起頭來擔當和議，在這種情況之下，參加和平運動只是替極右派擂鼓而已。當時我就提出反對的見解，對他這樣說：無產階級拾不起頭來擔當和議是事實，但無產階級也沒有力量阻止和議，這個事實却是更值得注意的。無產階級既然不能阻止和議，它便只有努力使和議的結果不至於太壞。無產階級雖然沒有力量擔當和議，但仍然可以監督和議。和議之後的右派的苦迭撻，不是迴避和議可以躲過的，而是只有從監督和議當中來移去這個惡果。無論汪派配不配講和，然而汪派總之是提出了羣衆渴待解決的問題講和，假使你們因爲避免汪派而避免和平運動，這纔是自暴自棄。你們不是迴避蔣介石的嗎？但你們在抗戰上頭和他有某種合作，爲什麼不可以和平運動上頭和汪派有某種合作呢？你們可以對汪派鬥爭，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和平運動的。結果是他搖搖頭，但我仍然相信我的論點是正確，他的是錯誤的。

說來也很可憐，中共宣傳蘇聯路線，實際是宣傳英美路線，蘇俄和英美一脫了鉤，蘇俄和重慶政府也跟着脫了鉤了。至今決定重慶政府的意志與行爲者，仍是英美，不是蘇俄。好在蘇俄和英美還不過是脫了鉤，沒有到決裂的程度，反映在蔣共的衝突上，也還不過是雙方已經感覺了不痛快，沒有到決裂的程度。將來隨着蘇俄和英美在世界戰爭當中合從連橫的變化，蔣共的衝突達到決裂的程度，是不遠的。然而這種決裂如果到來，也是只能有軍閥政客內閣的意義，不是什麼革命反革命的鬥爭。我們只是要注意到一點，即對中共採用堅決的手段的時候，不要連累了無辜，不要因爲打擊中共而摧殘到一般的文化自由與羣衆運動。

一年來的國內政治

曾芝生

二十八年過去了，我們回顧這一年來的中國政治，頗覺如未治亂絲，無有頭緒，一個尚未會建設起近代社會基礎的國家，而又墮入於戰爭破壞的深淵裏，政治的零亂破碎是毫無問題的。一年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政治的亂象，找不出一條正確的路線，始終只是在那裏動搖，衝突，幻滅，我們稍一回顧，便覺憂懼。在這裏，我特指出一年來的幾種重大的事實和趨向，以貢獻於國民之前。

第一是軍事獨裁下的政治亂象，一年來仍然未變，而且較過去更加變本加厲。軍事獨裁者要以黨以國殉私，其結果政治方面也自然隨私人之慾念而混亂旋轉，這樣，牠產生了下列的各項現象：

(一) 民主的精神完全消失，譬如國民參政會雖然照例開會，實則等於虛設，對於關係民族國家的和戰大計，幾曾有討論餘地？第四次大會中且有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決議，然在軍事獨裁制之下，參政會屬未能，憲政屬於何有？獨裁者對於國家民族的大計以一己勢位利害以為轉移，民意斷喪無遺。

(二) 制度名位混亂無序，軍事獨裁者既欲維護個人權位因此制度名位都成了私人工具，不復為國家常制，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國家最高軍職，而又下兼省主席，復兼行政院長，軍政不別，中央官與地方官秩亦極混淆。此外官因人設，職與位違之例尚極多見，遂致事有數官，官無定職，此雖為積弊，然一年來的事實證明在軍事獨裁之下，毫未有所改進。

(三) 黨被劫持，黨成為贅疣，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因此也被歪曲，黨員不但不能用民主制度來主持和戰大計，即黨中元老亦不能公開有所主張。如反共為黨國大政，黨中元老如林森等均主張反共，但

在獨裁制之下竟不能不如絨口金人半聲不響，朱家驊氏在香港雖然有過公開表示，但在獨裁者尚不欲開罪共黨之前，仍然不得不銷聲下去，黨的精神至此，可以說是毫無作用了。

第二是偏安政治的企圖，這是中國政治最大的一個危機，一年來這種趨向更加明顯。譬如蔣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又復兼行政院長，就政制而論，是混亂軍政與行政，破壞中央官與地方官的位序，純粹是獨裁政治下的一種亂制，但如就政治的動向而論，這是向着偏安政治前進的現象，獨裁者為着固執一己的權位起見，打不開濶戰的僵局，不能就整個的國家民族着想爭取光榮有利的條件以結束戰爭，於是乃企圖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同時企圖盤據一個地域造成偏安的局勢以維持一己的權位，這是獨裁者引導中國政治走上絕境的辦法，現在我要指出：為什麼這是絕境呢？

(一) 我們要知道歷史上的偏安局面，如東晉與南宋，都只是遭着僅有武力的外來民族的侵略，其時又沒有現在這樣險惡和變化不測的國際環境，所以可以苟延一時，但現在國際形勢非同昔時，而日本又非純粹武力的國家，偏安的局勢是決難維持的。

(二) 是歷史上的偏安局面，是黃河流域的經濟勢力混亂或破壞，長江流域可以自成一經濟區域，在保守着下游而上游亦未被控制的條件之下建設起去的，但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同了，現在的情形是：都市控制農村，交通路線控制僻塞區域，就整個中國而論，是東南與沿海的財富控制內地，欲就內地某一區域——即令富庶如四川——來作為偏安的基地，在重要都市交通線與沿海商埠以及國際路線都被佔領了的狀況之下是決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獨裁者不想打開僵局，而想以獨步的方式來維持一己的權位，事實上決會使中國政治走上絕境的。

第三是地方勢力共黨勢力與挾中央以號召的蔣系勢力的衝突與矛盾。表現出政治的不安和政局的不能穩定。我們雖然常常說軍事獨裁，但這種獨裁只見建立於各種勢力交互衝突的暫時均衡之上的獨裁，各以抗日的假面以相籠罩的，舍此，各項的矛盾衝突便要爆發。這是極大的政治危機，一年來的現象更加表現清楚，如四川省政的更替，雲南地方勢力和重慶的衝突，共黨首領毛澤東強硬態度的公開表示，均事例，這種情勢的發展，是要把中國的政治整個地拖入污泥的。

第四是重慶的政治對內而言，是各系勢力矛盾衝突的暫時均衡之上軍事獨裁政治，但就對外而言，牠却又是一個搖擺不定的尾巴，親英、親美、親蘇，時在轉換不定之中與徬徨失望的苦悶裏面，各國均基於其本身的利益變化其態度，重慶政府遂不能不有茫無所知之感，一年來的政治始終沒有一點獨立自主的精神，這種趨勢，如果獨裁者不能自悟其非，或是全國國民不能糾正羣起其非，其結果將不堪想像。

以上是重慶政府下一年來的政治趨向與現象，這種政治趨向與現象的繼續發展，將使中國國家民族陷入於破壞與滅亡的泥淖而無法挽救。在這種形勢之下，幸而有汪先生領導下的和平建國運動產生，一年來並且有蓬勃驚人的發展，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轉機，也是國

家民族安危所繫的一個樞紐，在這裏值得珍重地提及。

首先要知道：和平是中國國家的民族的本質要求，第一中國國家民族的地位需要用和平來保障她的安全，第二中國內部的社會經濟條件需要用和平來保障她的建設，第三是中國整個民族的天性酷愛和平，有和平的美德需要發揚，這是本質的方面，其次就外部的條件而論，國際方面有可能適用自主外交的立場以求致和平，而最重要的是日本已有和平的誠意，自近衛聲明發表以來，中國已有與日直接談判而能獲得光榮和平的可能，加以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運動，完全是一個愛國建國的運動，其發展的迅速驚人，自是必然的事情，茲揚舉和平運動幾個重要的宗旨和深遠的目標，便可確知這是一個富於建設性的政治運動，而一般的無知狂吠自將煙消雲散。

(一)和平是適應中國國家民族本質要求，一個「次殖民地」地位的國家，欲謀建設，舍取得和平保障之外別無途徑。所謂「抗戰建國」，只是在預備戰爭不可能結束時，主張一面抗戰，一面建設，使抗戰的力量可以延續，而其目的仍在獲得和平以從事安定的建設。任何人應該知道：戰爭是破壞的惡神，歷史上沒有從事戰爭的國家不陷入府庫空虛民生凋蔽的。兩強之間尚不容輕敵，何況一弱一強？抗戰兩年以來，破壞多於建設以及旋建設旋破壞的事實可為明證。

(二)和平是善用民族意志的，牠正確地引導民族意志走上一條深沉果毅的道路。使民族主義循由健全的路線發展，要知善用民族意

志，是可以斷喪民族意志的，無底止濫用的結果，必致戰局無法收拾，而民族意志亦必隨而一蹶不振。

(三) 和平運動是反對濫用的，一班無知淺識之徒，每每夢想着「最後的勝利」，實際「長期抗戰」與「抗戰到底」的結果，決非所謂最後勝利而是「濫利」，爲什麼呢？因爲濫戰下去的結果，總不出下列幾途：(一) 是連偏安的局面，一個完整一點的政治主體也不能維持，這時不但沒有言和的本錢，即再欲濫戰，亦不可得。(二) 偏安局勢與完整一點的政治主體既不能維持，剩下的是殘破的社會經濟現象，殘餘的地方軍事割據，零亂無紀的政治狀態，十幾年來的建國事業要從此墮敗，國家民族的元氣要從此凋零。(三) 大破壞與大混亂之下，共黨與其他盲動的惡劣勢力要抬起頭來，於大破壞之後再給之以破壞，國家民族更將陷入於不可救藥的深淵。這是濫戰必然要召致的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和固和，不和亦和，不是濫利是什麼呢？和平運動使是要爭取各種有利的條件以適時尋求光榮的和平防止這種濫用的惡果。第一是善用和平保留一個中心力量，可使牠以維持國內統一，使牠還有促進國家建設的可能；其次是要用和平保障已破壞的社會經濟有昭蘇復興的機會，而未破壞的不致再行破壞，設者必謂中國雖大破壞，但日本亦將吃大虧而無法收拾，這也是事變，日本濫攻的結果，亦必如是。但我們決不能拿日本的無法收拾來作爲我們的有法復原，拿日本的吃大虧來填補我們的大破壞，這只是一種意氣

的想法而非着意於民族國家利益的遠謀。

在汪先生領導下的和平運動，便是嚴正地把握着上述宗旨與現實條件的，所以自電發表以來，和平運動的影響一天一天地擴大起來，並且由於汪先生的領導，她經由黨的行動變爲了實際工作，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黨決定幾個重大的方針，第一是和平及共，第二是復黨建國。由大會授權汪主席邀請各黨各派領袖和賢能份子參加中政會，共同收拾時局，這一方面固然還是國民黨中心，但同時即已替人才主義和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礎，從此促成光榮有利的和平或作成和平的主體，導國家走上憲政的道路，建設起一個民族獨立自由民權徹底普遍與民生安樂健全的三民主義的近代國家。

這是一年來國內政治的一條新的道路和新的生命，牠糾正了重慶政府下的一切錯誤的政治路線，使國內政治有一條康莊大道可循。新年到來了，這個富有建設性惟一正確的和平建國運動，必將跟着時光的前途，展開燦爛的光輝。

歡 迎

批評，定閱，
介紹，交換。

一年來之中國經濟

方芬克

廿八年全年中國經濟，在內外兩重壓力下掙扎着，開春不久，在中央一再宣傳日本軍隊無法再繼續前進聲中，南昌首以無軍事價值為理由而放棄了。鄂北交界打擊日人進攻的勝利，幾於與法幣由六便士向三便士的傾瀉同時而來。汕頭之失守，還可當作一段小插曲。統制貿易，獎勵輸出，開通新國際交通線，獎勵沿海工業內移，獎勵上海資本內移，與限制內地資本輸出等法令，又隨着法幣跌價的新紀錄，雪片似的公布出來。軍需公債，建國公債，建國儲蓄，在中國財政基礎極端穩固的呼聲前後，與法幣發行額已超過廿六萬餘萬的報告一同問世。歐洲戰爭爆發，英鎊本身削弱，中國的法幣，未因與英鎊的連繫，而一齊跌價，反而稍稍上漲一點，於是被宣傳家利用了去以宣傳法幣基礎穩固。對外貿易，因進口貨關金單位未按法幣黑市匯價折合，而按一先令二便士官價折合，在表面上，為出超增多，這又是宣傳家利用的另一對象。德蘇結合，反共同盟無效，中國人跟隨英法，也宣傳日本孤立。英法的目的，在藉此以拉攏日本，中國人則又當作了抗戰必勝的催生符。日本對長沙進攻失敗，更增加了重慶政府抗戰的決心，但是不旋踵間，那個陳約隱稱為是個堡壘的廣西省的南甯，又在十天內，以軍事上沒有價值，西南另有新國際路線的理由，而被放棄了。法幣因此，又趨下游，這一次，人們無法掩飾事實的真像了。即使最以專家著稱的英文金融商業報，也不得不權一般市場觀察家之後，而認為法幣匯價之漲落，與和平空氣之盛衰有密切關係了。

英法美蘇，都開始以競賽者的姿態，爭與日本謀取妥協，使中國的金融界有了新的感觸，使得重慶政府，親蘇聯美的政策，瀕於危境。於是對內努力宣傳美國之行將制裁日本，以期博取金融界之擁護，與維持法幣匯價。宣傳蘇聯援華制日，以鼓厲士氣，並破釜沉舟的，在各線，特別是在南甯舉行反攻，以冀挽回英美法蘇的最後回顧。但是，英美法蘇，仍然向他們自己的目標前進，而中國的反攻，也似乎勝利消息，只有使新聞編者感到稿件充盈而已。國際間的動態，實際上，是法日已訂新商約，蘇日正作漁業談判，美日開正趨於和諧，商討新商約未訂前的通商辦法，英日間也正在談判天津存銀問題，一部份交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委員會，一部份則交與中立國銀行。這些，都表現着各國正與日本逐步接近，妥協。

因為前述這種戰區擴大，國際情形愈形不利，與法幣之跌價，遂使中國經濟界在這一一年中，始終在飄搖中。言建設，則會議與計劃多於事實，言貿易則出口額數未增，進口特旺。言各個經濟團體，則簿記上的盈利，或極可觀，而實際上，則萬物皆空，正合於佛教之旨。在滿懷悲憤中，我們分幾方面敘述一年來的中國經濟。

一 西南建設

西南建設，是抗戰必勝的最重要的基礎，建國必成的主要目標。但是，在實際上，則這一建設，仍是計劃多於實際。不要說及西康建設，根本是玄而又玄的理論產物，就是川滇黔湘桂五省的建設，除掉少數以外，也依然尚在討論期中。

建設的財源，是濫發的法幣與所謂認購不踴躍的建設公債，以及私人資本與銀行投資。

這幾項資財中，除去法幣以外，都不甚靠得住。銀行界，在外匯搞把與公債買賣中，已然耗費了大部份精力，那裏有閒情去關心這些。私人資本則根本未受獎勵移資西南的誘惑，因此，在西南方面，資

本依然很成問題。

在建設計劃方面，我們知道春天先召集了一個生產會議，這個會議，有什麼成績？其次執行建設西南大計的，有資源委員會，農本局，中央農業試驗所，中央工業試驗所，地質調查所，以及交通部與經濟部。這是中央方面的。各省，又各有建設廳及其他機關。機關重疊，計劃層出，新聞報道，不愁沒有材料，但是能有多少成績可言。

再就建設所需要的材料而說，由淪陷區域搬往西南的，本來即很少，更加以中國自身，始終不能建樹一條最後的防線，使這些機器，始終在移徙途中。新由國外買得的機器，因運輸工具之缺乏，與無力，也往往不能如意的運到。幸而機器運到，設廠地點，先成問題，其次是原料與燃料，再次是工人。這些問題中有一項不能解決的，所謂計劃，便不能成功。我們有許多材料，可以指明有不少建設計劃，是被某一二問題延擱下來了。

總之，在西南的建設，是難關重重，成績渺不可期。不過我們仍然想設法將已有的成績，報告一下：

在交通方面 中國正在努力中的，是三條鐵路，湘桂，滇緬，敘昆。湘桂路去年已通到桂林，今年因南寧失陷之運兵需要，方又通至柳州。柳州至鎮南關間，尙未通車。滇緬路，經過許多爭執，方把路線之西段決定，大部份地方，路基已在動工中，但因爲軌道與橋梁材料運輸之成爲問題，所以這一年中，尙沒有成績。敘昆路，有一段據說已經鋪軌，但大部份，仍在土方工作與測量工作中。

至於公路的建築，則比較得複雜一點，最成功的，要算滇緬公路，敘昆公路，與由重慶到陝甘的公路了。

農業方面之建設工作 大體可分爲二類，一爲農業金融，二爲作物改進。在農業金融方面，主要的爲各銀行對農村放款，據說已到二千萬元左右，及農本局各縣之合作金庫，與各省合作社之推廣。大概合作社以貴州有成績，其餘各省，皆在初辦中。此外，各銀行與農本局亦多設農業倉庫，裨益農民不淺。他如對於特種農產品，如茶農等

貸款，亦多少有些效力。

作物改進方面，大體上爲棉花之推廣，桐樹之廣植，及茶葉之改良。棉產推廣，雖在數字上，有許多進步，但以西南而論，其量仍不能自給，至於質的方面，更談不到了。貴州，四川棉產尙有希望，雲南則木棉甚佳；廣西根本無望。桐油之推廣，在短期內，不能有成績。茶葉改良，主要的是爲對外貿易着想，浙皖閩各省無庸說及，湘滇兩省茶葉之改進，對於將來貿易，尙有些希望。

西南礦業 在過去本即以雲桂之錫，雲南之銅，湖南之鎳，及五嶺一帶之鐵著名。錫之生產，雖有各種統制與獎勵，但仍爲小規模的土法生產，採礦技術，少有改良，鍊礦則仍無成績。錫礦，則廣西不易發展，雲南所費甚大，成績亦不顯著，且即使發展，錫出口與外匯之取得，亦不易發生關係，因該項外匯之統治權，久在雲南省政府與中央爭執中也。雲南銅與湖南鎳近多受政府統制。

煤礦，則因事實上需要，在西南崛起不少小規模土法開採的煤窖，大規模的煤礦，則尙未創設。鐵之生產，只是在四川，政府會努力發展，但目前成績，亦未見其佳，僅政府鍊鐵，與小規模鍊鋼有些成績而已。

西南礦業之發展，受制於三種原因，機器不足，燃料不便，與出品銷路成問題。在這幾項問題得到解決以前，除去軍事需要必須進行以外，其他礦業，很少有能在平時的經濟經營下存在的。將來的礦產開發，必需以交通改進爲其前提。

沿海工業地帶已淪陷，使中國工業受到嚴重的打擊。紡織業，幾於失去百分之七十的紡錘與布機。兩年來的努力，在西南方面，已移來，及計劃中的紡織廠，如已完成，則可有五十萬紡錘，五千張布機，較之戰前之百八十萬紡錘，萬八千張布機，相差太多。並且即使這些工廠，全部出品，也不足以應付西南的需要，這一點只要看西南各地紗布之昂高，即可明白。

大概在其他工業方面，設立中的工廠，不過是機器製造廠，電氣

用具廠，無線電製造廠，絕緣體製造廠等數廠而已。政府所辦較有成效者，僅爲數處電氣廠，但此種電氣廠之工業用電，亦不暢達。

在工業建設方面，實際上任何事，都沒有比紙上計劃更多些的。並且這種建設，也隨時都受各種條件的限制。比較上，年來所推行的工業建設，適合於落後的西南西北各區農業社會的，要算是工業合作社。

大概兩年來，中國各地的工業合作社，已有一千二百餘所，遍於十四省，會員有二萬人，並有倉庫五十餘所。合作社中之百分之三十，爲織造業，百分之二十爲製衣類，餘則爲製造日用物品。據說，全國合作社每月可製成四百萬元的產品。全國合作社總社借入款項，以發展業務者，約爲五百萬元。各區合作社，另外還辦有學校，以訓練技術與管理人材，這種事業，在中國僅是發端。如果大規模推廣下去，容或是今日貧困中國的一條出路。

一一 財政與金融

這一年來的財政，我們可以說是收入激減，支出倍增的一年。據財政部公佈說，這一年來支出預算額，已達廿八萬餘萬元。而收入額，實際上，已微乎其微了。關稅，只有戰前的百分之十五，還在中國手中，鹽稅，當亦相差不多。統稅，根本沒有了，所得稅，遺產稅，也都在西南開始實行，能有多少結果？大概政府現在的稅收收入，實際上，不能超過戰前的百分之廿。支出增加，而收入劇減，究竟政府是怎樣維持的？無疑的，只有借債與濫發紙幣，或動用法幣準備金。

報紙上一再宣傳外國要借款與中國，到後來，結果總是一場空，英國只有幾十萬鎊的信用借款，法國根本沒有。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借款千二百萬萬元，也只限於購買美貨，這些，都不能支持中國戰時財政之鉅額支出。一時謠傳的蘇俄將與中國以信用借款，更爲無稽的謠言。

只有去年，方有兩次各五千萬美元的易貨借款。

謠言，既然一個個的不攻自破，中國戰時財政的把戲，也就逐漸露出原形。法幣準備金之挪用，幾於是公開的祕密。法幣之濫發，也成爲人民心中的必然事實。就是那個很想隱蔽事實，而謬稱法幣基礎穩固的財政部，也不得不承認法幣發行額已超越廿六萬萬元，實際上，這一數儘管不可靠，若與戰前相比，法幣發行，已超過了戰前將及一倍。若果將各省省銀行及所謂邊區銀行之鈔票，也計算在內，恐至少鈔票也當在三十四五萬萬元以上。

法幣的濫發，便是重慶政府財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挪用法幣準備金，是財政部始終否認的，但是，他們仍然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準備金，是分存在倫敦與紐約。美國決定不再以高價購買白銀時，中國又公承認中國不受損失，因中國的白銀，久已易爲外匯，這也就是說，中國法幣準備金早即用光了，美國貶價購銀當然中國不會受損失的。這是重慶重要財政支柱之二。

在推銷公債方面，我們覺得政府不會有多少成績。廿七八年兩年來內債的發行，有如下表：

關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廿七年五月	國幣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美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國幣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英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廿七年五月	國幣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國幣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國幣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八年四月、八月兩期
國幣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國幣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八年六月十兩期
國幣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五月	國幣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八年六月十兩期

我們看，只是廿八年發行的公債，即爲十二萬萬元。可見重慶政府的財政支柱之一，就建在公債身上。可惜，財政部也不得不承認，「大多數之內債，皆由國家銀行承銷」，一般人是沒有負擔能力的。銀行家接受到這些公債，再轉而濫發紙幣，以使一般人民蒙受其害。

因爲以濫發紙幣，作爲財政挹注的一種重要手段，所以雖有英國匯豐麥加利兩銀行，借款五百萬鎊，中國交通兩銀行提出五百萬鎊以爲法幣平準基金，但基金運行未及三月，在六月初，法幣匯市，即不能維持黑市之八便士匯率，劇跌而至六便士半，再跌而至八九月中的三便士半。法幣的前途，幾乎走上馬克的舊路，幸而歐戰爆發，法幣又逐漸上漲，而回復到十一月的五便士以上。及乎南甯失陷，法幣又再跌到四便士左右。由法幣跌價，我們可以窺知重慶政府財政的支絀。目前，法幣價格的維持，由於中國對外貿易，因歐戰關係，出超稍增，但實際上，還是由於人民看到戰爭之不能持續，和平之行將到來。一旦息戰，內地經濟活動恢復，貿易開通，則法幣價格，或可上漲。可惜，這一點，我們的重慶政府，假裝着不懂。

在這裏，不能不談及外匯統制。廿八年中葉的一大變化，是重慶政府鑒於法幣跌價，已不能再維持那一先令二便半的官定匯率。出賣外匯的責任，於是中國與交通兩行來擔負。如果中國出口商出售貨物於國外，則外匯由中交兩行按官價收買，然後再按中交兩行的外匯行市，給與商人以差額。大概中交兩行公佈價，常在六七便士左右。如果商人要向中交兩行購買外匯，則需於官價之外，要按兩行行市，交納「補價」。這就是，重慶政府已不以一先令二便半爲法幣官定匯率，而隨時以中交兩行的佈價爲匯率了。這一點，自然是設法剝削出口商人，以津貼進口商人的手段，而重慶政府還在那宣傳其爲獎勵出口啊。

至於其他的金融設施，財政部的命令，是不絕的發出，地方金融會議，也舉行第二次，這些命令與會議，究竟能有多少效力，確成問題。值得在此地提及的，只有中，中，交，農四行組織聯合辦事處，以蔣介石爲主席，這是以刺刀統制金融，以消弭金融界，特別是四行的爭執的辦法。

二 對外貿易與統制

這一年來的對外貿易，雖然有財部的獎勵，與流俗經濟學者所說的法幣跌價，可阻抑進口，獎勵輸出，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綜括的說，這一年來的對外貿易總額幾乎比去年增加了二分之一，不過這種增加，全部集中在上海一埠，其他各地，貿易總額，反有減少。這一點，便是打破那些主張法幣無底貶值，放棄上海匯市諸人理論的

一個嚴重的難題。另外，一些人，都由於財政部及宣傳家的文章，而希望中國可有一出超現象，實際上，他們對失望了。一年來入超總額仍然繼續增加。按照黑市法幣匯率折合的中國本年首十月間對外貿易比較如下：(單位元)

項目	本年一至十月	去年一至十月
進口	二, 六五四, 八六一, 〇一一	九一三, 二五一, 五〇一
出口	七三九, 一八八, 三九三	六〇〇, 九四七, 二八五
總值	三, 三九四, 〇四九, 四〇四	一, 五一四, 一九八, 七八六
入超	一, 九一五, 六七二, 六一八	三一二, 三〇四, 二一六

本年十個月間的入超總值，已然是十九萬萬，比去年同期，竟增加了五倍有餘，這便是我們所謂「戰時貿易政策」的成績。固然，因爲中國進出口貿易，本年來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上海已非重慶所能統制，所以全國貿易數字，因而受到影響。不過，我們即就重慶所能統轄的海關的進出口按黑市外匯價格計算起來，一般的也是入超。表列如下：(單位千元)

關名	進口	出口	入超	出超
北海	三, 六六四	一五, 四五七	—	二, 七九三
蒙自	四三, 一八一	三一, 一五七	—	一三, 〇二四
溫州	六, 二七九	一一, 七七九	—	五, 五〇〇
雷州	二四, 〇一七	一三, 六七九	—	一〇, 三三八
江門	一, 八八五	一, 三八一	—	五〇四
騰越	六, 九六四	三, 一〇四	—	三, 八六〇
思茅	七六九	三六八	—	四〇一
總計	八六, 七五七	七六, 九二五	二七, 一七, 二九三	—

上表中，可以看出只有北海與溫州兩關是出超，其餘的全是入超，出入相抵，依然是入超一千餘萬元。

以下再談及統制貿易

中國的統制貿易，本是爲外匯着想。藉統制進口以減少外匯支出，藉統制出口以增加外匯頭寸。外匯統制，因上海失陷而無效果。局處西南一隅的重慶政府，便不得不另作打算，先增加出口貿易統制與必需出售外匯的貨物種類，於是桐油，麻，錫，茶，更增加上豬鬃等十數種，最後因運輸工具之缺乏，與路線之加長，乃逐漸由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直接經營。終且弊端百出，外匯統制之基本的法幣官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九)

望雲 寄自內地

十七 抗戰建國綱領

抗戰建國綱領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的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製定的，全文除敘言外，分總則、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衆運動、教育等七大項目，共三十二條。這個綱領是因應時勢需要，容納大衆要求歸納而制定的，要算是現在及今後中國建國的準繩，不僅適用於戰爭時期。

戰時不同於平時，抗戰發生後，大家都有製定戰時行動綱領的要求，各黨各派更想以共同製定共同行動綱領的辦法，作為組織聯合政府的階梯，也是作他們擴官分權的初步。民國二十七年春的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本是為解決戰時及戰後一切問題而召集的，製定戰時行動綱領當然也在代表大會考慮商討之列。據說抗戰建國綱領的發端，是某君起草的中國戰時行動原則(?)。這個所謂原則的草案冗長無雜，沒有系統，沒有中心，沒有方法。某君將草案上呈於蔣委員長之前，蔣先生便交陳布雷先生修改提出，陳又約請陶希聖先生漏夜修改，才成了抗戰建國綱領的初稿。這個初稿與其說是修改而成，還說是全部新作來的恰當些。陶陳二位先生修訂而成的草案名稱，也不是抗戰建國綱領，後經多人幾經改易原稿，最後由汪先生審核，定名為「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確切，扼要，響亮而有力。這個草案經過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議決公佈，成爲有名的抗戰建國綱領，是中國建國運動的劃期界碑。

抗戰建國綱領製定的動機，是中國國民黨認爲有「請求全國人民捐棄成見，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統一行動之必要，特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外交及軍事政治經濟民衆教育各綱領」，其作用在「使力

量得以集中團結，而實現總動員之效能。」「抗戰建國綱領」在總則中確定兩大原則，一是在建國的理論上「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爲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一是在建國的力量上確定「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全國集中，全力邁進」。這兩條重要的原則充分的顯示出中國的建國原則，只有「一個主義」，即是三民主義，領導中國抗戰建國的政黨是中國國民黨及其領袖蔣委員長。無形中已否認了什麼國際共產主義的價值，也確定了其他黨派的附翼地位。

抗戰建國的綱領敘文以下，緊接着的就是外交，外交項下最重要的規定是規定我們外交運用的精神與原則，所以外交綱領下有一條道樣規定「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這裏說明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的原則與立場，中國決不爲獲得別國的援助而聽受別國的支配，也決不爲聯合別國而甘作別國的附庸。這一條表現出中國人爲中國事的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一條批判忘却了其祖國的立場而攀附其他國際奧援的謬誤理論。我們已因日本摧殘我們的獨立自主的精神而從事抗戰，也決不能爲獲得別國的援助而自己拋棄其獨立自主的立場。抗戰期間不是沒有想假藉外力變更國內現狀的喪心病狂者，抗戰建國綱領中這一次正是對着他們而發的。其他關於軍事政治經濟的規定，不必一一闡述，在民衆運動項下有這樣一條的規定：「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當時有些人藉口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以便擴充其個己的派系勢力，所以抗戰建國綱領中特別規定，「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

合法之充分保障。——這個限制很嚴正，即是民衆任何活動的自由皆有，但不能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現行一切法令。後來有些人便斷章取義，硬說抗戰建國綱領已允許充分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了；意若曰由此民衆便可自由活動，豈不知他們是故意略去「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的限制，事實上怎能容許你有無限制的自由呢？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教育項下有條重要的規定是：「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注重於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與擴充其設備」。所謂注重道德修養，提高科學研究，全是針對時病的良藥。本來忽視道德是五四運動的流弊，善為國家民族謀者，應當糾正之，疏導之，不應當再火上加油，使已經破壞的道德更加殘破，使已經日下的世風更加蕭條。有些人便不如此，想他們正好利用道德破壞引誘人民做些不忠於國家，不孝於民族的勾當，而出賣其祖國，降附敵人。至於提高科學研究，是這些年來罷課廢學運動的痛苦反省。有些人為的紊亂社會秩序，故意鼓動青年學生罷課，廢學，跟着他們東奔西跑，外侮日急以來，野心者更藉機勾煽，以為廢學便可救國，鼓動的很多十幾歲的青年人都廢學從事活動去了。所以在陝北的某路軍中，有所謂十歲左右的「小兵」，「少年先鋒隊」，他們就不想想，這正是證明樹人的教育破產，這正是毀壞民族未來的生命。談到未來，他們或者不懂，不信，抗戰發生以後，我們自食其惡果了。專業科學研究，鼓動不讀書的結果，是抗戰一年以後，中央為補充下級軍官及使用新式武器，而招考學員，就找不出够用的青年來，這不是傷心慘目的事麼？

這個抗戰建國綱領公佈以後，博得全國民衆的擁護，全國輿論的好評，所謂各黨各派也無不心悅誠服，認為國民黨臨全代會製定的綱領扼要而正確，是抗戰建國的準繩。惟有中國共產黨不當抗戰建國綱領為全國奉行的原則，說是什麼國民黨一黨的產物，是國民黨一黨的行動原則。全國奉行的最高原則應當由全國的各黨各派來共同製定，

否則各黨各派沒有奉行的責任。這一套話不是完全胡說麼？不是自吹其身價之高貴麼？中國國民黨以革命手段掌握政權已經十多年，而且國民會議中又會鄭重決定在訓政時期委託國民黨代行行政權，如此國民黨的行事是代表全國民衆的，國民黨決定的事就是全國民衆決定的，國民黨奉行的決議就是全國民衆信奉的行動原則。所謂全國民衆包括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口中所有的民族，階級，及各種職業者，所謂各黨各派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是站在民衆的以外，當然也要奉行中國國民黨什麼民衆決定的事項。在抗戰期間，除了漢奸外，都受國民黨的統治，服從國民黨的決議，遵守國民政府的法令，稱「中國共產黨」雖然有什麼帶有國際性的政黨，你們的黨員尚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決不是背叛祖國降附敵人的漢奸，你們難道不遵從國民黨的決議，不奉行國民政府的法令麼？共產黨對抗戰建國綱領的謬論一出，被大家批駁的體無完膚，罵的一錢不值。「中國共產黨」有不顧羞恥的天性，仍在那裏嘵嘵不休，於是我們的理論導師，——陶希聖先生，目擊心傷發表了「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的講演，從此壓沉了一切「抗戰建國綱領」為非全國性的而為一黨產物的謬論。

「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是陶先生五月初間對武漢教育界的講演，講稿整理後於五月十五日發表於武漢各報紙各雜誌，國內各報均加轉載。我在前文已經說過這篇講演被共產黨的要人稱為一篇利害文章，壓得他們從此對抗戰建國綱領不敢再哼半個不字。這篇文章長達萬言，是開揚抗戰建國綱領的正確傑作，而且是唯一傑作。因為抗戰建國綱領公佈後，蔣汪兩先生忙於軍政無暇為文開揚，要除了陶先生這篇講演外只有周佛海先生一篇廣播講演，題名「抗戰建國綱領的兩點認識」，此外就無人加以闡述了。所以在文化界中常常可以聽說國民黨的理論家，蔣汪二位總裁以下，只有陶希聖周佛海兩位先生。周先生在北伐以後的幾年是國民黨的惟一理論家，陶先生在抗戰前後是國民黨唯一的理論家。除了他們兩位以外開述國民黨的理論，

解釋國民黨的政綱政策者，找不着那一位可以稱得起是國民黨的理論家。周陶二公隨汪先生離粵以後，國內的文化界一時又陷於混亂，國民黨不復能掌握着文化運動的主潮也非是無因的了。

陶先生的「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的講演，共分兩大段，第一段說明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第二段說明抗戰建國綱領內容的要點。在第一段以前他總括的說明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他說：「這一次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一個具有極重大意義的宣言，和一個博大精深的抗戰建國綱領，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生存和發展的唯一規則準繩。我們依照這個抗戰建國綱領去作，不單是在抗戰時期的各種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法，就是抗戰結束以後的國家社會各種問題，也都可以得到解決。所以這一個綱領無論在教育方面，軍事政治方面，或社會經濟方面，都是今後的一個規範，一個準繩。」在第二段他分三點來說明，第一點是「自法律的觀點來看綱領的地位」，「在法律上，抗戰建國綱領是中國政府執行的，這個綱領是中國國民黨對於國民政府指導的原則，是國民政府今後法令與行政處分的根據」。全國人民對於國民政府是權力服從關係，在國民政府之下任何人都要服從政府的法令，如有人可以在國民政府的法令以外存在，那便是國內有國，不獨全中國的人民不肯承認，即是世界各國也加以否認。第二點是「自政治的觀點來看綱領的使命」，「抗戰建國的工作，是國民政府所領導，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所領導。」所以，現在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三者之間已沒有方法分開」。因之，「我們在積極方面，要絕對服從進行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建國工作，以及指導這個工作的綱領，消極方面，我們要認識中國國民黨的失敗，就是中華民國的失敗，中國國民黨的滅亡，就是中華民國的滅亡」。第三點是「從綱領本身看出它的期待」，臨時代表大會宣

言已明白表示希望有志之士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的原文也要求全國國民不分界限，以綱領為準繩，一致從事於抗戰建國的工作。中國國民黨既把黨公開於全國國民之前，「則任何意見的國民，任何利害關係的國民，只要有抗戰的思想與決心，有建國的思想與決心，都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都可以按照抗戰建國綱領而工作。這一個綱領的本身，乃是公開的，舉國一致性質的」。

陶先生在第二段說明抗戰建國綱領內容的要點時並參考宣言分四點來敘述。第一點是「以民族主義對抗強暴侵略」，因為中國正受日本的侵略，中國應發揚民族主義以團結民衆，對抗日本，「除此以外，無論是世界主義，或是國際主義，統統不能救中國，毀棄民族思想與國家界限，在一個殖民地國家和附庸國是宗主國所期望的。」所以日本要毀滅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蘇聯則以共產主義來宣傳「就是因為我們有民族思想和國家界限，所以我們要保持民族國家的自角獨立，絕不受任何國家的支配；所以我們才以民族抗戰來給敵人以血肉的回擊。假使我們的民族主義意識有一天消滅，也就是我們亡國的一天。反之，我們的民族思想能够保存並發揚，則我們不獨可以在日本軍隊沒有達到的地方，發動偉大的抗戰力量，就在已經佔領的地域，也能發動民衆的抗戰力量，終會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第二點是「以民主制度集中全國國民力量」，中日戰爭是中國民族的解放鬥爭，關係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國不幸戰敗，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一戰而勝，即可一躍成爲獨立的民族國家。所以這次戰爭，就是建設工作的開始，中國要在政治上完成民主政治的建設以促成近

代國家的確立。中國國民黨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法，不同與一般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所行的方法，它是要先掃除部落思想，割據主義等民主政治的障礙，建立一個領導民衆破除封建勢力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到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想把這種民主政治，在抗戰時期中樹立的更切實堅固，以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合全國各方面的意見、各方面的力量，一方面努力抗戰，一方面積極建國。就是說，我們今日於民主政治的確立，一方面是集大權於中央，一方面是集中全國國民的意見與力量，適應於抗戰的環境。爲了實現這種民主政治，所以國民黨在政治上開放國民黨的組織，希望全國有志之士都參加，在法律上保障人民在三民主義原則下，與法令範圍內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使全國民衆的意見，經過國民參政會而貢獻於中央。第三點是「以國防計劃建設國民經濟」。中國想建設成個現代的國家，須先發展工業，發展工業須要資本，還須要有充實工業的原料。這樣中國在發展工業之時，日本無力量供給資本，中國工業發達之後，日本又無法復在中國獲得原料，所以中國工業發達，是與日本自身的利益相衝突的。因此日本不惜兩次三番的用蠶食鯨吞的方法，來掠奪中國的富源，阻礙中國圖謀富強的建設計劃。「這一次的對日抗戰，也就是解放我們的工業的開始。過去我們的工業不發達，即使有一點，也因在沿海一帶，在這次抗戰中受到戰事的破壞，現在我們要維持抗戰，一定要發達我們的工業。在抗戰中發達社會經濟，一定要按照國防計劃，從事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建設。到了抗戰結束以後，我們的經濟，就是計劃有組織的國家生產與交換制度的經濟。在國家資本下有

計劃有組織的生產與交換制度，這個意義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沒有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分別，一切利益歸於國家，一切利益歸於社會，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一個民主主義的經濟。在這意義上，抗戰期中的經濟建設就是民主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建設。第四點是「以科學的原理與方法來培養國民道德與提高國民智識」。現代的戰爭是科學戰爭，現代的建設也都是科學建設，發展工業固然須要科學，現代政治與行政各方面的建設也需要科學，無論是抗戰與建國統需要科學。可是中國的科學並不發達，不發達的第一個原因是「中國舊會遺留下許多封建束縛」，第二個原因是「日本的侵略」，日本阻礙中國的工業發展，中國工業既不能發展，科學發明便無所使用。第三個原因是「一種符咒式教條式的宣傳」。一般人忽視科學的重要和對科學抱錯誤見解，都是一種缺乏理智的感情衝動，表現而爲一哄而起的行爲，一哄而起只是煽動革命的方法，不是抗戰的方法是對內的方法，而不是對外的方法，對外抗戰，必須得採用有條理的計劃和有實效的方法。有條理的計劃和有實效的方法必都是由科學的研究而來。用科學的方法組織民衆，用科學的方法設備物質，則抗戰方能持久，方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有效的打擊。所以臨時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中，特別提及科學，願請全國智識界注意。宣言中昭示國民對於科學的運動，要技術與社會制度貫通，戰時與平時貫通，物質與精神貫通，感情與理智貫通。「這些是陶希聖先生那篇「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全文的大意，它是被共產黨的領導者稱爲一篇利害文章」，它是歷的共產黨一語不發的文章，它是贏得全國的擁護與讚賞的文章，它是闡揚抗戰建國綱領的惟一而正確的傑作。

論 建 國

白 瑞 光

自產業革命以後，科學急劇進步，十九世紀末許多民族都建立起現代的國家來。英國在資本主義經濟下，以憲政的發達早已建設了近代民主國家，美國由於天賦資源之豐富和歐洲傳來之優越的科學文明，使她於獨立後立即成爲世界強國。德意志的統一，意大利的建國和日本的維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不過三五年便都躋於富強。中國經濟社會演進遲滯極久，清代的政治是一個封建軍國，更阻礙了國家的進步。鴉片戰爭以來國人被外洋勢力所驚覺，惟許多有志之士幾經努力仍然沒有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康梁的維新變法，李鴻章的倡辦洋務，張之洞的創辦工廠，丁汝昌之訓練海軍都是向建國途徑上努力。這些人士最重要的觀點是鑑於戰爭失敗而側重軍事。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建立起民主政制的形式來，這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建國工作之第一階段。但是封建軍閥雖然有擁戴民國之名仍行割據之實，連年內戰，建設無從作起。北伐成功剷除了封建勢力，統一了中國，但又偏重政治，近年在經濟制度上改革與建樹雖漸漸入手，但其進步之遲緩，改革之枝節而不普遍實不能適應我們的要求，經這一次中日戰爭又全數都破壞無餘了，這樣一來建國的要求愈形迫切。

論起建國，真是偉大而艱鉅的事業，尤其是在國家瀕於危亡的今天，大戰之後，滿目瘡痍，沒有雷霆萬之力，怎能修談建國。建國的基本條件是要中國有力量，因此我們的國家必須獨立自主並有完整行政主權，再具體點說，必須中國全國領土，無論已未淪陷，都置於一個對外獨立自主，對內統一的主權下面，才有力量建國。但這個必待中國人的努力而後才能實現，因此和平運動便是建國的手段。不過，如果這種運動成功，我們怎樣把他建設成爲現代的國家，便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建國的目的不僅在恢復中日戰前狀態，更須把戰前不合理的狀態改進，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建設一民主義的國家，使國家繁榮光大成爲現代文明的前趨。這並非期望過奢，因爲大破壞之後本可以有大的進步，但看我們能不能作最大的努力罷了。

建國方案經緯萬端，決非寥寥數千字短文所能道盡，這裏舉出些舉世大者，約有，經濟，法制，軍事，文化與教育四項。

經濟建設

經濟建設爲建國的首要問題，沒有經濟基礎決不能言建國。此次中日戰前，雖內地遲滯於農業經濟和官僚資本的小規模工商業中，但沿海各大商埠，新興的民族資本已如雨後春筍大有欣欣向榮之勢。政府的政策漸漸注意農村，如改進稻麥，設農本局指導合作等，雖其組織與工作與我們的希望還相差的很遠，但已立下基礎，需要改進與發展是必有現象。中日戰爭對於中國經濟上第一個大影響是農村的破產，在戰區破產之下，農民房舍田莊均已焚毀，農具破壞丟失，農民微少的積蓄都因逃難流亡而消費淨盡，農民本身的被徵兵編入軍隊，有的被徵作戰事的補助工作，有的被包括捲入游擊隊裏大刀會裏去了，有的被徵火所犧牲，大多數的逃亡流離散於四方，中小地主自然是逃入都市作純消費者，即小農也不免逃入都市圖謀改業，但戰爭中人口集中於有數的幾個有租界的都市，如何能得就業？因此他都作了純消費的人。在未淪陷的內地，捐稅苛重，徵發頻繁已使農民疲於奔命，而因貨幣價值跌落，物價暴漲，一般人民生活愈趨餓死平糶以下，大多數農民不得不萬分勤苦的耕作，但既無生存必需的資本，改進農業技術更談不到。在淪陷區內一切均作戰時的統制，人民生存尙未安定，秩序尙未完全恢復，資本逃避無人肯作農業上所需的長期信

用，生產自屬低微。就新興工業論因海沿作戰關係各大工業都遭受重大損失，一時不易恢復。少數遷入內地，但笨重的機器廠屋等固定資本不能遷移，祇好任燬火之犧牲。又因為交通不便，出產品祇有現地銷售，市場萎縮，售價又受貨幣變動的損失，一般工業也不能掘強維持。況且中國根本沒有幾個大規模的工業，一般工業沒有公積金或大量資本，無負擔重大損失的能力。新興民族工業剛在童年，正上進發育，那堪受此戰爭的打擊。就商業論主要在資本逃避，因為社會不健全，有錢的人都蓄藏生金銀或購外匯外幣，外國銀行利市百倍。為了避免國家戰時的重稅，公債的攤派，大宗的資本都由內地源源的外流，有租界的都市反見虛偽的繁榮。除了有租界的二三都市外，因為貨幣的窖藏，銀行不能吸收遊資，這樣對工商業新的投資絕少，銀行或其他金融業又多被迫停業。資本缺乏已使商業不堪。而尤重要者在交通的阻隔，運費奇重，在輾轉運輸時到處均有全部貨物損失的危險，而外匯漲落不定，一日數變，都是商業上重大的困難。

針對這種戰爭的破壞我們第一要復興農村，復興農村的第一要義在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先除掉戰時狀態對人民生命的威脅，才可以勞來戶口，安定農村。其次是治安問題，也就是保障農民財產的安全。這兩個問題雖不是經濟建設本身問題却是經濟建設所必需的先決條件。農村安定，治安與秩序恢復農民才可以還鄉復業，因為農村的安定，長期信用的農業投資也可以因之加多。這還不夠，在這大破壞之後必須以政府的力量幫助農民再建生產所必需的資本，尤其是固定資本如田莊房舍應由政府貸款籌建，農具，籽種，肥料應由政府製造或統籌購運分配以平價售予農民，或貸予農民。（因此我們想到建設之始必須大量資本，這個自可依照總理利用外資開發中國資源辦法）（詳後）一方面須政府設立長期信用的農民銀行，專營農民貸款，並恢復各式的農村合作，以增農民的資力而使農村金融流通。農村金融有一種顯著的季節性，這種需要資金孔亟的季節在中國南方與北方各地

均有不同。因此各地農民銀行應視農業金融需要而周轉。因為需要的季節有前後，調濟資金到可方便，不至有各地同時需用大量資金之困難。

農村建設，不是單單的有了資金便可成功。其次的重要問題是農產品之運銷。現在世界各國對農產品的價格大都予以統制，穀賤則傷農，而凶年飢饉又有食糧缺乏的恐慌。穀賤的原因表面常是豐收，供過於求，實則不能外運是原因，而且市場上的供求關係不是真正的人民需要與生產的供給。以米一項論中國米每年有輸出，同時輸入洋米很多，這完全由於市面商人祇看到利潤的多寡，計算運費與價格關係，不顧人民的需要所致。因此須由國家統籌。加以農產品因農民經濟困難不能等待最有利的時間（下次收穫以前）和運至最有利的地點。中間收買轉手商剝削太重，必須國家設便利農民運銷的機關，如農產品運輸的減低運費，農民運輸合作，農產品轉運公司等可使農產品運至最有利地點出售。如農產品抵押借款銀行，農民信用合作等可使農產品存至最有利的時間出售。

復次便是農業技術改進問題，怎樣培植作物，怎樣選擇籽種，怎樣施肥，怎樣驅除害蟲，怎樣改良土壤在中國農民都墨守幾千的舊法。其中土壤的改良更非政府力量以百年大計之遠見施行不可。江蘇南部之電氣解水，山東之虹吸改良土壤，以及無機肥料之使用表現中國農技術已見改進之萌芽。但進步過於遲緩且係極小部份之畸形發展，大部分內地廣漠農田都用舊法耕作。這由於中國自然科學基礎太弱，一般農民缺乏資本無力改進。農資問題已如上述，對於科學技術之促進我們有下列主張。（一）廣設農科職業學校造就農業中級人材，（二）設農科各系專門研究所試驗農場作農學之高深探討。（三）按各地特殊自然環境使中學生普遍傳播農業常識，以訓練現有農民。（四）在普通高中添設農業學程，在假期回鄉以談話講故事形式廣為宣傳。按現時中國農民尚不能容納新的科學技術，他們不接受新的科學技術

是由於他們對科學沒有信仰，他們沒有信仰是由於農的人材不能造成作物發達的事實作證明。這個必先由試驗農場以示範，農民們看到農場裏的作物收穫的豐多，質也優，便自然會模仿。最好是不要有官廳命令的形式以發農民疑懼。據著者所知江浙兩省農民知識較為進步但對於改良的蠶種還推行不廣，安徽省之推行帽子頭稻種，也因爲宣傳不夠，不甚普遍。反之遼寧人看到朝鮮人種稻和種甜菜利厚，却由自然競爭而學會了。我們認爲推廣新農業技術應注意此點。又與農業聯聯之林業、畜牧、水產、養蜂、養蠶等技術都應開辦專科，廣爲造就人材。爲農業基本的自然科學如生物、化學、地質、氣象等也都須努力提倡，切實獎勵。

關於農村建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整理耕地」。爲了耕作方便起見國家向人民建議互換或出讓。尤其山地之梯田，高處與低處，近處與遠處，其耕作之勞費更可因互換而可以節省。

經濟建設之第二要務是恢復並發展大規模的近代工業。近代工業以大量生產爲要義，大規模的工業才可以得到生產報酬遞增的利益。在現在中國情形大規模的工業須由國家扶植，國家不予保護，獎勵與提倡，怎能和先的進歐洲資本競存。提倡工業的辦法有減稅、免稅、減低運費，保障商標，授予專利權，加入國家股份等等。再次爲國家直接經營。三民主義主張工業社會化，在節制資的政策下鐵路礦山等大實業私人無力經營者應由國家經營。但在一般工業以不由國家經營爲宜。應當視工業之性質可以官商合辦者合辦，否則任私人經營而由國家派遣監察員，或以立法形式加以限制。最好由國家担保所欲獎勵實業之股息，扶植其自力發展。國營或公營產業應注意下列三點：（一）依生產合理化，採用科學管理方法（二）絕對避免官廳的形式，中國官營業多壓迫人民，常常利用國家機關之權力以取得私經濟關係上特殊利益。又因爲採用官廳的形式以致職員不負責任，祇按月支薪以敷衍爲事；且人事費浮濫，管理不合科學方法種種弊端不一而足，此

自應加避免。（三）國營或公營生產事業應與國家財政分離，即會計獨立，換言之財政虧欠不能向官營業提取款項。必待公營企業結賬盈餘始繳入國庫。

工業和交通的建設自應以總理實業計劃爲根據。其中尤以重工業之倡辦應在最先，開掘礦產，開發交通爲發展各部門產業之先決條件。工業用燃料，煤炭、汽油之開掘、動力工業之水力、電力蒸汽力工程（即煤）和一切原料工業均應盡先創設。特別是水力，應依照總理實業計劃利用三峽水力使長江流域電化利用黃河龍門水力使北方電化。至於國防工業，民生工業（衣、食、住、行）亦應同時舉辦。

國營大規模工業自需大量資本，此種資本自應以股票，銀行存款，儲蓄等種種形式利用本國資本，或勸誘國人直接投資。本國資本不足時即利用外資。利用外資應注意下列兩點：（一）外資應以借款形式，投資者不能因借款關係而直接干涉工業內部行政。（二）政府借款應確作生產事業之用，不能以此彌補財政上之虧空。

工業建設除輸入流動資本之金錢外更須輸入固定資本之各種新式機器。此外更須輸入近代的科學技術。中國工業不能完全聘用名外國技師，除加緊造就各級技師工程師人材外，更應造就工頭人材，除開辦工頭一類的工科職業學校外更須對現在工廠工作之職工加以技術教授及訓練，各工廠中均應由國家開辦工人補習學校，補習的科目應該就是他們本身職務上所需之技能，決不可陳義過高徒涉空論。在管理方面應採用最新的科學工廠管理法，各種工業之製造生產均應合理化，這正是總理所說迎頭趕上去的辦法。

各種工程、工業技術、工廠管理均以高深的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爲根基，因此純科學（對應用科而言）之獎勵提倡更不應不遺餘力。再有，工業的各部門都是互相密切關連的，決非單獨一門畸形發展所能濟事，因此提倡工業雖有輕重緩急，但對各部門的均齊發展一點也不可忽略。

經濟建設之第三要務是商業之統制管理。商業之骨幹是倉庫，運輸與銀行，一般商人徒以營利為目的，多不顧國計民生。因此國家須加統制管理。倉庫屯積貨品，應由法律規定國家可以隨時強制其開倉銷售，以防居奇壟斷。其次是運輸，運輸的另一面看便是交通，交通對於經濟、文化、政治、國防的影響均極重大，無庸贅言。因此經濟建設的一部依是依照總理實業計劃疏濬長江，導治黃河，開鑿運河（如湘江桂開運河，遼河松花江開運河）修建鐵路、公路、開辟航空路綫，以便商運。惟有建設交通才可以繁榮商業。

除交通外對於商工等業最有關係的是銀行，中央銀應當是銀行之銀行，其使命在扶助農工商業之發達，與普私人銀行純以營利為目的者不同。中央銀行應當與國庫分離，本行內發行紙幣與營業部亦應分別而獨立。應仿英蘭銀行制度，營業部需用紙幣須以十足準備之生金銀外幣或貸款提單交付發行部始能換取紙幣。國家財政虧款決不能以增發紙幣彌補。國家可以向中央銀行借款，其借款雖比私人為優越，但基本精神須是有對價的，如以租稅公債担保是。關於私人銀行之管理亦須根據銀行法規嚴加監督以防其倒閉或以他種形式侵害私財產法益。

商業上重大問題是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為國家經濟繁榮之根源，是經濟政策之基幹。由於對外貿易而生的國際交易差額可以增殖財富。所以一個國家必須努力增加輸出，以我國而論，連年入超過額更有增加輸出的必需，以免金貨外流。出口必須統制，其要因在國防上必需品、人民生活必需品而無代替者以及發展本國農工業必須之原料等均應加以限制，務使出口貨物適合於國家所要求之目的。凡粗製濫造等足以防害對外貿易之信譽者也應限制。入口必須統制，一在限制我國新興工業競爭之物品或影響我國農產品市價之物品。一在抵制外國不正當的傾銷（dumping）一在歡迎生產機器和其他我國所需之貨品。對外貿易之統制方式一為明令禁止出口或入口，或以法律規定合於某種條件或履行某種程序者（如商品檢驗是）始得出入口。一為以關稅之輕重減免為限制。一為國家統制外匯以下售予外匯與否或售予多少為限制。關稅政策也是保護本國農工商業最重要手段，又是財政收入之大宗，因此在經濟建設中，關稅必須重新釐訂。而關稅政策實須絕對自主，除互惠的優待條款或其他公平平等的協定，不受任何

國際的拘束。對外匯之統制，除為統制對外貿易之必需手段外，更是安定本國貨幣之要圖。在統制的對外貿易政策下，國家可以計算國際收支差額，而以生金銀外國貨幣或貨物抵補。以貨物抵償就是輸出入平衡，此為上乘，輸出入平衡，外匯價格就不變，外匯穩定，就是本國幣制的安定。國家的經濟政策必須以此為努力的目標。

幣制問題在經濟建設中為最重要。中日開戰以來法幣的破壞為最甚，他的影響遍及於全國農工商業和其他自由職業的人民。幣價跌落之害及國計民生為人所共知，所以整理幣制刻不容緩。整理幣制的辦法（一）須統一全國幣制。中國內地紙幣本未統一，中日開戰以後各地幣制更為複雜。法幣跌價將失掉其為交換中準之資格，必須重新整理，而將全國貨幣完全統一，其發行權應集中於中央銀行，其他任何公私銀行不得發行。且紙幣之形式從分幣，角票以至十元百元者式樣均應劃一，以便辨認。（二）新國幣對外匯之比價由法律規定須維持其不變。（三）按照全國對外貿易和國際支付差額情形，而於世界各大經、都市存儲準備之生金銀和外幣。（四）紙幣發行之數額須以純經之理由而估計且須不影響外匯之穩定。（五）貨幣須與財政分離。財政上之虧空，不能以增發紙幣彌補。（六）中央銀行不能隸屬於財政部。（七）中央銀行按法定比價無限制售賣外匯。但購買外匯者必須為購買外貨或有其他極正當理由，買外貨者須於買外匯時，呈示貨物定單，由中行直接與賣貨之外國廠家接洽。（八）以法律嚴定操縱或偷買外匯或抑揚法定比價之懲罰辦法。（九）對生金銀和銅、銀由國家嚴格統制。（十）現任財務行政之官吏或中央銀行之各級職員，不准兼營金融商業，如有利用職務上的權力、影響作金融投機事業的，除將現行刑法修正加重其刑罰外，更須沒收其家產之全部或一部。（十一）由民意機關或監察院或法定名額之人民得推舉代表，可以隨時檢察中行發行貨幣之準備情形。（十二）國內市場交易不得以任何外國貨幣為標準。綜合上述幾項略具經濟建設的梗概，經濟為國家生存之命脈，所以建國事業不能不從經濟開始。（未完）

和平運動的認識

鮑淑文

殘酷的屠殺威脅着整個世界的和平的今日，中國固然從二年多的戰爭經驗中獲得了恐怖的教訓。幾千萬百姓的各地逃奔，無數屋宇的被毀，以及無數可以豐收的田產的被蹂躪。從實踐的體驗中，每一個百姓的心坎裏，都罩上了一個死亡的陰影，無人不對着戰神的降臨感到焦慮與不安。在歐洲呢？同樣在侵略者的暴行下，無數弱小民族的生命與財產都犧牲在炮火的轟擊下，釀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地獄，到處都噤力盡地爲和平的需要而吶喊起來。但是，可憐的是還有一部份被利用了的淺見者，依然盲目地歡迎着殘酷的戰爭。當然，在那種有色彩的虛偽宣傳中，難免有着一部份人被騙進了他們的圈套，結果皂白不分，做了第三國際者的工具，促成了人類更大的不幸！這是在我們眼着目前的歐洲，因爲蘇聯的侵略芬蘭而釀成了歐西民族的不幸，以及「抗戰到底論」者在遠東固執地拉長戰局而釀成中國百姓的苦痛日深的今日，感到最痛心的事！因爲「一舉手間」的錯，亦即所謂「一念之差」，遠東和平便毀於一旦，而今日且還拖長不放，其令人痛心，又加一籌。爲民族前途，國家前途，自不忍再守緘默而爲全國人民告。

戰爭所賜予人民的利害如何，我們早從現實的生活中體驗到了，沒有再來多贅的必要。而和平之與我們的利害如何，我們也從現實的生活中體驗到了，同樣也沒有再來分述的必要。但是，時至今日，我們對戰爭的認識却不能不格外給予謹慎的觀察與估價；或者，對和平運動又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等，都不能無一個新的認識，這是我們覺得該先爲全國人民提出的一個思想上，或者是認識上的大問題。

自然，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對中國的現狀應該先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尤其是中日戰爭這問題，其前途將循怎樣的途徑來解決，在目

前已有了兩種主張：一是個人英雄主義在陳腐的思想中作祟而釀成的「抗戰到底論」。一是全以人民的生活立場爲立場的「和平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戰局的解決不出於繼續抗戰，當然祇有和平的一法。既然如此，那麼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是隨着時代的遷變而不同了。當七七事變之前，我們不會十分瞭解日本的各方面，所以祇輕輕的一經第三國際者的慫恿和威脅之後，立即便揭起了「以抗戰來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幟。在當時，因爲我們并不十分理解日本的多方面，這種錯誤當然是不能過份的追責的，但經過了二年多的角逐與戰鬥的實驗的今日，依然還把當時的主張拖到現在一味蠻幹，那麼我們便覺得這當中却有了需要考慮的地方了。在這考慮中，我們先要把「戰爭」和「鬥爭」兩個名詞，清楚分解明白，原因是這裏面使無數的人民誤會了，結果便因誤會而迷信了戰爭，反把戰爭看作唯一解救今日的中國的「法門」，於是便接着一錯再錯，一直錯到現在依然不會覺悟轉來，這也可以說由於誤解了「戰爭」和「鬥爭」，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對這個誤會的闡明是很需要的。——下面一段理論，很足爲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前的參考：

「本來，「一部歷史都是鬥爭史」。有「思想鬥爭」，「政略鬥爭」，「經濟鬥爭」。也有一個階層推翻另一個階層的政權的鬥爭，有國家與國家間的鬥爭，也有帝國主義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鬥爭，更有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而鬥爭的逐漸發展，會達到戰爭的爆發。戰爭是鬥爭的一種方式，戰爭是鬥爭的發展。我們是在鬥爭中過活，而并不能就說：「人們那天不在戰爭中討生活。這些說法，是不瞭解鬥爭和戰爭的異同。說「因此，實在不必要恃武力戰爭展開

以後才說是在戰爭」，也正是沒有研究鬥爭和戰爭的異同的表現。這也就必然的會降低了對戰爭的嚴重性的估計。也正是因為將思想鬥爭，政略鬥爭，經濟鬥爭武力的戰爭看成一色一樣的東西，并且將各種戰爭的本質看成毫無二致的東西，所以一般的人們也就把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也估計得沒有一絲兩樣的地方。

以上一段文字，我們覺得確實是為一般的中國人所忽略了的理論根據。因為對這問題的不能理解，也就促成一般人民對戰爭的態度上的歪曲，這就普遍地為一般人所誤解為：「既然是無日不在戰爭中討生活，那麼戰爭有什麼稀奇」？於是便對戰爭覺得是一件兒戲般的事，尤其是第三國際極力地煽動與威脅下的中國青年人，把中國不能再繼續的作戰而不顧一切的硬拖下去的戰爭，蘇德瓜分波蘭的侵略戰爭，蘇聯侵略芬蘭的搶劫戰爭都覺得必不大驚小怪，橫豎人類是在戰鬥中討生活的，不能避免的。所以對這些戰爭的爆發不加反對，採取了放任的，也就是在客觀上幫助侵略者和強武者的態度。這種態度，在「百食不饜」的領土野心家如目前的蘇聯，及為個人英雄主義所奴役了而毫不顧惜人民生活塗炭的顯武主義者所最歡迎不過的啊！既然這樣，那麼我們毫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嗎？不，決不能如此簡單，而環境也不允許我們如此簡單。其實呢？我們對於戰爭是決不能機械地採用一種贊同或是一種反對的態度。我們對於蘇聯依強凌弱的侵略芬蘭的戰爭，對為個人英雄主義而不顧人民一切生活的困難的戰爭，都覺得非給以最大的反對不可。我們應該認識蘇聯的侵略芬蘭，完全是除佔領其土地而外，更要奴役整個芬蘭國民的初步工作。能够獲得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與獨立的和平而不願謀和，偏要為了個人的歷史，把全國人民置諸水深火熱而不顧的拖長戰爭，是驅人民於戰場，替少數統治者去充炮灰，犧牲了人民的血肉替他們保護和爭奪財富，對人民有什麼益處呢？所以這種戰爭，我們應該絕對的反對。

同樣的道理，顯武主義者對和平運動的破壞，就是企圖破壞人類幸福的戰爭，是為了個人的地位與歷史而不惜消滅了大家所仰望的國家的戰爭，所以我們對這種戰爭也應該反對。但是，翻轉來說，為了國家的生存，為了人民的生活與和平的戰爭，我們却應該極力的主張。

這樣，我們贊成芬蘭國英勇的軍隊對企圖赤化世界的蘇聯的侵略暴行作最忠勇的戰爭，因為這是為歐西弱小民族的和平前途建築保障的戰爭。同時，我們還企盼着美國，會為了歐洲弱小民族的和平，毅然放棄了其傳統的孤立政策，出而阻止蘇聯的暴行，且應具有不惜為和平一戰的決心。否則，美洲和平的受到威脅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在這種形勢之下，美國的準備和蘇聯作戰是對於歐西各弱小民族的，所以我們除了對芬蘭應有十分的同情之外，更應鼓勵美國毅然為和平出而干涉蘇聯，在中國，形勢就不同。不同的所在是中國可以獲得無礙獨立和自由的和平而不和，更為共產黨的劫持，不惜為蘇聯在遠東打頭陣，為他們的利益，甚而為侵略者開避侵略的大道以速自己國家民族，滅亡。對支持這種戰爭的人，我們非但應該給以反對，同時還應該喚醒民衆的自覺，為自己的生存奮鬥。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目前的顯武者，已經不顧一切地狂喊：「抗戰到底」，「焦土政策」。把和平運動視作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幻想，甚而把和平運動當作是一種反革命的行動，更進一步且有人認為和平對被壓迫者說，就是不變動的壓迫，是剝削的別名。這在目前的芬蘭，也許是適用的，但用在今日的中國，却又并不適用。因原是：芬蘭要求和平，且情願割地以求和平的獲得，而中國則有和而不利，徒然拖長戰局，自趨末路。

其實，和平是人類大多數的一致要求，不要說中華民族，就是整個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民族是需要殘酷的戰爭來屠殺自己而不要安居樂業的「太平洋世界」的。目前芬蘭的抵抗蘇聯雖然是不幸而引起了戰爭的爆發，但在戰爭爆發之前，芬蘭何嘗不為了和平而「委屈求全」地

再三請求蘇聯予以談判的機會，但蘇聯却毫不顧惜地整個拒絕，這能說芬蘭不是要求和平而反對戰爭嗎？德國聯合了蘇聯把波蘭瓜分了，引起英法等國為條約上的義務所關而毅然參加歐戰，能說他們不是要求和平而反對戰爭嗎？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經過了二年多戰爭的實戰，從無數困難中認清了戰爭的恐怖之後，對廢戰作戰的否決，對和平運動的擁護，更足為我們說明人類無不要求和平而反對戰爭的。從這些經驗中，很顯然的告訴了我們：和平不僅是勞苦大眾的要求，也是一般愛好和平的人們，尤其是真正愛國者的要求。共產主義的走狗們，第二國際的爪牙們，把中國的和平運動目為「反革命」，實在是因為中國的和平一旦實現之後，第三國際對遠東的侵略必然地增加了無數的困難條件。因此他們不能不盡力的驅逐著他們的工具，把中國的戰爭拖延下去。這理由是：一方面削弱中國將來抵抗第三國際侵略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消耗將來侵略中國時，日本的活動力量。否則，不獨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和平是反革命嗎？人類大多數為了人類幸福而要求的和平是反革命嗎？那麼不是反革命的人，祇有那些置人民性命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專門為自己個人的歷史打算盤的贖武者了！

其次，我們還得進一步對中國的政治趨勢作一簡明的檢討。「八一三」事變之前，中國政治在蔣介石政府的策動之下，急起直瀉地流向獨裁的一條路，這是在過去為留意中國政治動態的人所不會不知道的事實。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共產黨便發動了所謂「雙十二」事件，這事實的演變！已成為公開的祕密。所以現在的重慶政府，雖然在共產黨的劫持下，不得不裝着「容共」的姿態，但實在企圖流瀉到獨裁一條路上去的希望，依然還是非常濃厚。（——故國共間目前的一合作」，無疑就是暴風雨降臨前的沉悶時期。等到這一個短促的時期過了，那麼狂風暴雨必然地傾覆了重慶政府的存在，而促成蘇聯侵略中國的動機。那是無法避免的，如果重慶政府依然甘為共產黨所左右的話。那麼抗戰的結果就算是勝利了，人民物質上的損失暫且勿論，就以獨裁政治的抬頭，給中國人民精神上的苦痛來說，亦不為我們所歡迎。這裏，我們又引用下面一段文章作為闡釋：

「和平運動也是反對獨裁的，是維護民主自由的。這是人類大多數人的要求，……因為民主自由的喪失，獨裁恐怖的抬頭，是制

制和壓迫的增加，這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更痛苦，也給革命增加了更多的困難。如果在中國要能維護民主自由，只有使人民的團結更廣泛和鞏固，使人民的利益更提高，更能推進革命。民主自由對人民的生活和活動是有利的。人民能有更大更強的組織，一定能夠制止贖武者的戰爭行為。這種和平運動何嘗是維護現狀呢？……」

綜合以上所述各節，我們覺得我們的要求，非但要求和平的實現而已，而且我們為全國人民在政治上應有的自由，更應進一步而要求有一個「使人民利益更提高」的新政府。這都是千萬以上的被拋棄在生煎煎中的百姓的期望。他們無一不嗷嗷待哺的孩子，在等待着有一個慈善和平的母親給他們以安慰。這種事實，出現在都市的任何階層，也出現在農村中的任何一個村落；更無分男女老幼，也無分富貴貧賤，為了現實的生活與國家民族的生存，都無不同聲期禱和平的到來！這都是不能諱言的事實，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

總之，我們除了在事實上無法諱言人民對和平的需要是非常迫切之外，我們還覺得再有理論上的解釋，使一般知識份子能够深深地理解而為和平運動前途增添一支新力的必要。這就是我們要重新再說的：「和平并不與鬥爭相衝突」。在和平的情況下，反而更有利於我們的鬥爭，如果全世界各國國內都有強大的和平運動，對本國的贖主義者給以打擊，和使人民拒絕參加戰爭，那麼戰爭的爆發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應該從今後清楚地認識和平運動決不是維持現狀，更不是安於被壓迫。決不是放棄鬥爭，決不是反革命。換言之，和平運動的本身就是鬥爭。和平運動的展開，可以避免戰爭，可以制裁贖武者的暴行。目前中國的人民既然為戰爭而感着無限苦痛，那麼停止戰爭必然就是中國民生問題上一個急待儘先解決的前題了。同樣的，在日本也是一樣，祇有日本的人民起來發動和平運動，起來制日本的贖主義者，使中日間立即停止戰爭行動。如此則中日兩國的人民生活，自然可以將殘餘的一些精血，為未來的國家民族前途作一番生存的鬥爭。中國和日本都應該以「反共」為己任，在共同目標下，防止遠東的赤化，這實在是一件不容緩的事，我們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才大聲疾呼，為和平運動努力！

歐戰第三四月

張立恭

雖然歐洲西部英法與德國的戰爭，又延長了兩個月，戰場上的戰鬥，依然未能開展，特別是陸上。海上戰爭，因英國宣布要加緊封鎖德國，德國的飛機與潛水艇，在北海于十一月底時，特別活躍。由飛機上投下帶降落傘的水雷，隨水飄盪着。英法商船在這期間，損失特別多。於是英國便請德國會使用一種磁性水雷。不過，這種戰爭與商船之損失，十二月份以來，便逐漸減少了。英國說，這是由於英國海上已獲得控制權，德國潛艇已有半數已被英國擊毀或俘虜去了。

至於軍艦的戰爭，則德海軍先擊沉幾艘英國軍艦，及以武裝商船改成的巡洋艦。十二月中間，英國軍艦，終于也將在南大西洋活動的德袖珍艦格拉斯比號擊傷，最後這隻兵船，因為無法衝破英國海軍的封鎖，而自沉在烏拉圭海岸。海上戰爭的成績，不過如此。

英國加緊封鎖德國的行動，開始于本月初。在事先，先受到荷蘭，比利時，瑞典，日本及美國等國的反對。事後，日本船山陽丸又強硬的在荷蘭裝載着德製機械，弄得英國，也沒有方法制止，反讓牠過去了。這一下，使人知道英國的封鎖計劃，有些也難于實行。

實際上，英法這次對於德國的封鎖，遠沒有效力。德國對於西歐中立國的貿易，並不受封鎖，十二月末，他還與丹麥訂立新商約。波羅的海沿岸的貿易，英國根本沒有辦法封鎖。經由意大利，他繼續他在外洋的貿易，經由蘇聯，他與遠東仍然運轉着，近日上海，就有不少德國貨是經由西伯利亞運來的。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貿易，是英法與德國競爭的對象。南斯拉夫，在以前是與德國有密切的商務關係的，戰後依然繼續着，只是十二月末，法國方面也插手到南斯拉夫，與之訂立商約，但這並不是說，南斯拉夫與德國商務關係就要斷絕。對於德國特別重要的羅馬尼亞，戰前，英德競爭即格外利害，戰爭爆發後，一時間會論傳着德羅關係不甚佳良，不過最近，德羅商約又行

簽訂，貨幣換算比率，亦行規定。自此，德國戰時需要的煤油，鐵與糧食，將可由羅馬尼亞供給一部份，更加上，德國最近與蘇聯議定的，在蘇方統治下之波蘭境內連絡德羅的鐵路，在三年內，不得改成寬軌，更使羅國貨物，易于運輸，這一點，自然更給與德國多少方便，間接的更加打擊英法對德封鎖的計劃，何況，德國背後還有一個蘇聯在那裏作無盡藏的供給呢？

★ ★ ★
除去歐洲西線戰爭無開展與英法封鎖計劃無效以外，歐洲最重要的事，當為蘇聯之進攻芬蘭。

蘇聯于瓜分波蘭，俘虜波羅的海諸小國以後，就開始向芬蘭提出要求。十月末莫洛托夫的演說，即逐漸暴露出芬蘭雖小，確不願屈服于蘇聯之前。十一月中，在各方呼籲之下，芬蘭代表再度到莫斯科去談判，蘇聯仍然不改變其侵略決心，於是談判無結果。十二月初，蘇聯就正式宣布蘇芬邦交斷絕，且立即進兵攻擊芬蘭。進兵不到三日，在芬蘭稍有立足之地，蘇聯就開始演唱其扶助弱小民族的好戲，為芬蘭人民，設立了一個「人民政府」，將蘇聯多年豢養的芬蘭共黨，指定為領袖。蘇聯並且裝作真事一樣的，與這個人民政府，簽訂了一個互助協定。把他過去向芬蘭要求不得答應的條件，都一一的與「人民政府」談判妥當。這樣，蘇聯似乎已得到「勝利」了。

不過，在戰場上，芬蘭並不示弱于蘇聯。芬蘭的孟納與陣線，蘇聯是不敢正面攻擊的，於是只得在冰天雪地中去進攻芬蘭的北部與中部。在初時，似乎蘇聯軍隊也銳不可當似的，不過，三禮拜的戰鬥，蘇聯完全失敗了，侵佔得的土地，又再被趕出。紅軍的聲勢，繼蘇波之戰之後，第二次為之掃地淨盡。在失敗之後，史大林又遷怒到共產黨中主張武力對付芬蘭的人物，前駐芬大使，據說因報告不實，與芬

蘭「人民政策」的領袖，同被槍決。

看形勢，蘇聯對芬蘭的進攻，除非等到明年夏初雪冰溶化以後，是不會有多少結果的。在這期間，史大林是不是會知難而退，是很有興味的問題。

蘇聯進攻芬蘭，雖未得到勝利，蘇聯本力，確因此而招致到世界各國的憎恨，除去以蘇聯援助為宣傳支柱的重慶政府，及希望以日蘇妥協，作為對英美之要脅的日本。

在蘇芬談判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即曾提出和平談判的呼籲，奧斯羅公約諸國，也先後發出呼籲，但是蘇聯沒有理這些。蘇芬戰爭既起，世界情形，更形大變。

意大利首先表示對蘇聯的憤慨，並且實行援助芬蘭，有一時間，會喧傳着德國也援助芬蘭，嗣後方證明不確。南美洲諸國，態度最為激昂，英法方面，也極為關心。張伯倫在議會中，特別指摘蘇聯之侵略。不過，他認為蘇聯之敢於侵略芬蘭，還是由于德國之引導，德國是侵略者的源泉，所以他必需先打到德國再說。

世界各國的新聞，與雜誌，除去共產黨及其走狗以外，都逐漸將那個鼓吹和平的史大林，看作劊子手了。

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集會議，他們先決定請蘇聯于廿四小時內答覆，他準備停止軍事，和平談判。但是已然踏上侵略者之途的史大林，無法回頭，他拒絕國際聯盟的提議，於是與會各國，由智利提議，將蘇聯判決為侵略者，而將其除名，並且要求各會員國，分別援助芬蘭。

在這一期間，蘇聯引起世人的憤怒，似乎遠比德國來得兇些。很可能的，蘇聯將成為世界公敵，可惜的，是英法還沒有決心而已。

英法于表示先要應付德國以後，他們又決意援助芬蘭，同時，他們又考慮到，如德蘇搭配起來，對斯干狄納維亞歐半島用兵，對於

英國在北海的海軍優勢的影響，並且設法，使瑞典與挪威遭受侵略時，可以接受英法的援助。這一計劃，似尚在討論中。

歐洲這次反蘇運動，只是在萌芽，還沒有發展。其所以沒有發展的原因，固然由于英法態度之不確定，也由于蘇聯于進攻芬蘭時，特別對羅馬尼亞表示好意，這樣，使巴爾幹各國一時還感受不到威脅，另一方面也由于意大利態度之突然變化。

意大利外長齊亞諾，最近曾發表演說，表示意大利與德國的同盟關係，仍然存在；巴爾幹中立集團的計劃，暫時無實施的必要；對於英法，他沒有說及什麼，對於蘇聯，他也沒有像意大利報紙那樣激烈，他只是說明墨索里尼是歐洲反共的第一人。

照他的演說分析起來，意大利態度所以這樣表示的原因，一是由于他與英法的談判，還沒有好的結果，二他雖然反共，反對共產黨伸入巴爾幹，如果蘇聯決定不向這方面走，他倒希望巴爾幹半島各國能與德國保持良好的經濟關係，只要德國不在這方面作侵略佔領土的行動即可，英法這方面的活動，意大利也不高興，因此，他以支持德國的姿態，停滯了他的和平中立集團計劃。三是意大利雖然希望歐洲有一反蘇陣線，但如像英法所主張的先擊破德國應付蘇聯的辦法，意大利也不能贊同，他們是希望英法先與德國停戰，再共同對付蘇聯，較為得計，因此齊亞諾的演說，支持德國的意味居多，而對於反共反蘇反暫時沈寂下來。

總上所述，歐洲戰爭的原始敵對國家間的戰爭，依然沒有開展，經濟封鎖，實際上不易有效。逐漸成為世界公敵的蘇聯，現在已遭逢到嚴重的失敗，不過世界各國對蘇聯的惡感，一時還沒有發展成反蘇陣線的可能。英法現在正在歧路上，反蘇不反德呢？反德亦反蘇呢？這兩條路線未能決定，遂使意大利的態度為之曖昧，自然，意大利方面或許希望英法走前一條路，這樣可以解脫德國，同時又與意大利歷來的主張相合。英法過去拉攏蘇聯的幻想，在這二月中確已消沈了。歐洲戰爭的外交戰，尚需有新的醞釀與發展，方能使戰局開展。明年春天以後，或許是一切有新生氣的時候。

史大林與第三國際

W. G. Krivitsky 著
燕妮 譯

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產生於莫斯科。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他又在莫斯科受到致命的打擊，因為莫洛托夫與德外長里賓特洛甫簽定了德蘇協約。對於世界各國，這一協約，確是一鉅大的震動。對於我們這些曾久與史大林共事，且久已知道他的行動動向的人，再沒有比這件事更不值得驚異的了。

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的一個早晨，我正同瓦林斯基（Volynski），格柏烏的反間諜組長，坐在莫斯科的露比安加大廈十層樓上他的辦公室裏。突然的，我們聽到街上的音樂與唱歌聲音，向下看去，我們看到正有一隊人在遊行。這些人，奧國社會主義軍，Shutzhunists 的三百份子，他們會勇敢的，在維也納營壘中，與法西斯德軍戰鬥過。蘇俄允許這一小隊社會主義戰士避居在這裏。

我永不會忘記這一五月早晨；忘不了舒斯團員在進行中的快樂面孔；唱着他們的革命歌曲，Bruder Zur Sonne, Zur Freiheit；忘不了許多參加遊行的蘇俄羣衆的偉大同情心。許久，我幾乎忘了我在什麼地方。這一點，使瓦林斯基把我帶下樓。

「克里維茨基，你覺得其中有多少間諜呢？」他以最自然的口吻來問我。

「沒有一個，」我憤怒的答覆。

「你大大的錯了。」他說。「在六七個月內，其中的百分之七十，都要坐在路比安加監牢裏。」

瓦林斯基，在史大林機器運行的路線上，是一個好審判官。現在，這三百個奧大利人中，沒有一個還在蘇聯。許多，在他們到後不久，便被捕了。其他的，他們雖然知道本國要怎樣對付他們，但仍然成羣的跑到奧大利使館，去要護照，準備回到祖國去受那長期的監禁。

「在奧大利受監禁，還比在蘇聯自由好些」，他們說。這些難民的最後一個，於西班牙內戰時，被蘇聯政府送到西班牙的國際縱隊中去了。

史大林，迅速的走向全能獨裁主義的路上，共產國際久已放棄其原來的目的了。

廿年以前

共產國際，於廿年以前，由蘇俄共產黨創辦，那時，人們相信歐洲正在世界革命之前夕。列寧，共產國際的指導者，認為西歐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黨，因擁護其政府所進行的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而失掉了勞動階級的擁護。他相信德法英美的舊勞動黨與工會同盟，因相信代表制政府與到更公平的社會秩序之和平進化，已然完全是過時了。因此，為各國勞動者，準備革命領袖就是那個已然完成革命的俄國共產黨的責任。列寧的幻想，是一個歐洲共產聯邦，最後，是一個世界共產秩序。

列寧，確認定布爾什維克黨，雖然他們先得到在俄國的勝利，如無前進國家中之勞動階級之援助，他們不能建樹一共產主義社會。他認為他的勇敢試驗，行將失敗，如果落後的農業俄國，連一個大工業國家的聯合，都得不到。他特別希望德國的快速共產革命。

過去的廿年，證明列寧低估了已有的勞動組織，工會式的與政治式的組織的嚴重性，並且過分看重了西歐之採用俄國式的布爾什維克組織，與其戰鬥口號，打倒一切政治組織，民主的與君主的政治，以及建樹國際的共產獨裁。

廿年來，共產國際創建起來，且由俄國共產黨鼓動與指導着，想將俄國的方法與程序，移植到蘇聯境外。他在各國設立共產黨，且嚴格

的按高度集權與紀律化的查爾什維克方式，去組織他們，使他們對於莫斯科參謀本部負責且服從。

各處皆機關

他在世界各處設立機關，他在歐洲，遠東與西半球計劃民衆示威武裝暴動。終於，這一切企圖都失敗之後，在一九三五年，又提出他的最後的政治行動，人民陣線。在最後階段中，利用煙幕與諷刺等武器，他完成了他的最大進攻，在許多民主國家中，他伸入政府各機關，與民意機關。

由最初到一九三七年，十七年中我的地位，是一種在國外可嚴密觀察共產國際活動，與直接參加革命行動中的軍政部份的地位。我是史大林干涉西班牙的執行工具之一，在西班牙內戰中，共產國際，最後一次，使其武力參預戰爭。

在一九二〇年，蘇波戰爭中，我第一次爲共產國際作工作。那時候，我正爲蘇聯西線情報部工作，總機關設在史摩倫斯克，當都察契夫斯基之紅軍，進向華沙時，我們部裏的作用，是在波軍陣線後，秘密煽動分裂，阻礙軍火運輸，以宣傳進步波軍之鬥志，並爲紅軍參謀部供給軍事政治情報。

與波蘭共產黨合作

因爲我們的工作，與在波蘭的共產國際支部的工作，沒有顯明的界限，我們在各方面，盡可能的與新近組成的共產國際支部的波蘭共產黨合作，我們出版一種革命的報紙，*Svit*（曙光），分發與波軍。當杜察契夫斯基進向華沙城門時，一個農民代表但巴爾在波蘭國會中說：「我並不認爲紅軍是敵人。相反的，我歡迎紅軍，像波蘭人民之友一樣」。

對於我們，這事是很重要的，我們登載但巴爾演詞於曙光報，且分發幾十萬份與波蘭人，特別是波蘭兵士。

被指爲間諜

但巴爾立即被捕且被拘禁於華沙城，可怕的波蘭政治監獄中。蘇聯政府，於三年後，終以許多被質的波蘭貴族與僧侶，交換得他的自由。他到莫斯科來，被譽爲共產國際的英雄。許多的榮譽，都堆在他身上，且被任爲共產國際的高職。十餘年中，但巴爾，是共產國際中一個最重要的非俄籍人。

在一九三六年，他被捕了，據說他自在波蘭國會演說後的十六年中，都是一個波蘭間諜。格柏烏判決說，但巴爾之歡迎紅軍，以及三年監獄，都是波蘭情報部的預定計劃。但巴爾被殺死了。

在蘇波戰爭中，波蘭共產黨與我們部裏共同工作，並且我們也設法使之與紅軍合作。波蘭共產黨，服從前進中的杜察契夫斯基的紅軍的一切命令。

組織罷工，怠工

波蘭共產黨協助我們去組織怠工，鼓吹分裂，且阻滯法國軍火之到來。我們在但澤組織罷工，以阻滯法國軍火之卸交波軍，我跑到華沙，革拉克，林堡，及德捷西里細亞與維也納，組織罷工以停滯軍火運輸。我在捷克鐵路交叉點之阿得堡地方，組織一次成功的罷工，勸誘捷克路罷工，不要將斯科達軍火交與畢魯斯基的波蘭。

「鐵路工人」，我在一傳單中寫道，「在你們路上，你們正運輸着去殺你們的俄國勞動階級弟兄的槍砲」。

同時，爲準備華沙陷落而組織的波蘭蘇維埃政府，正隨同着杜察契夫斯基的參謀部，向波蘭首都前進。德辛斯基（Felix Dzerzhin）（Kv），勇敢的波蘭革命者與赤加（Cheka）——格柏烏的初名——的領袖，也被莫斯科任命爲波蘭共產政府的領袖。

蘇波戰爭，是莫斯科以紅軍子彈推廣布爾什維克主義於西歐的一個苦難的企圖。儘管我們一切政治及軍事努力，儘管紅軍已勝利，儘管在我們的政治宣傳者與情報人員背後有共產國際波蘭支部的活動，但是這種企圖失敗了。最後，那些已作了過分工作的疲憊的紅軍，

被迫退回了。列寧之經由波蘭，與德國勞動者攜手，以援助他們推動革命到萊茵河的希望，完全失敗了。

用武力侵略以促進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觀念，更早些，在一九一九年，當匈牙利與巴伐利亞諸短命的蘇維埃共和國時代，即被人提出過。紅軍部隊離匈牙利邊境，不過百英里，不過那時候，布爾什維克黨人太軟弱了，且正為自己之生存與白黨鬥爭着。

當一九二一年初，蘇波簽訂里加條約時，布爾什維克黨人，特別是列寧本人，已然看出要想使西歐有成功的革命，是一種困難且需長期間的工作。當共產國際第一二次大會，主席齊諾維也夫宣傳一年中全歐洲將是共黨天下時，實際上，國際規模的革命之迅速勝利希望，是並不存在的。但是，在莫斯科雖然已看到沒有立即爆發革命的希望，他依然於一九二一至二七年間發動了許多冒險與推動工作。

鉅萬人被犧牲

在這一串不負責任的企圖中，德國，波羅的海與巴爾幹諸小國及中國的千萬工人，確無必要的被犧牲了。他們被共產國際之賭博，一件絕沒有成功希望的軍事暴動，總罷工與叛亂的害人計劃，拿去當砲灰了。

在一九二一年初，在俄國，環境特別不利於蘇維埃制度。饑饉，農民暴動，克隆什達之水手反叛，與列寧格勒工人之總罷工，使政府已到崩潰的邊緣上了。

當布爾什維克黨人盲目的遇到會是其推護者之工農水兵的反對時，似乎一切內戰的勝利，都無用了。共產國際，看到這種絕望的境况，決定挽救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惟一方法，是發動德國革命。齊諾維也夫遣派其可靠的部下，加拉堪 (Tela Kan)，前匈牙利蘇維埃政府領袖，到柏林去。

一九二一年，三月，加拉堪到了柏林，帶來齊諾維也夫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德共黨中執會的訓令說：「在德國已有革命的機緣，共產黨應即奪取政權」。

德共黨不信

德共黨中執會懷疑了。他們幾乎不相信他們的耳朵。他們知道他們無法推翻柏林政府。不過加拉堪帶來的訓令是這樣清楚：立即暴動

，廢除威瑪共和國，在德國樹立共產主義的獨裁。德共黨中執會，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德國共產黨，是齊諾維也夫領導，與列寧，托洛斯基，布哈林，拉底克與史大林指導的第三國際之支部，不能不服從命令。

在三月廿二日，在中德之曼斯裴與黑爾斯堡工業區，宣布了總罷工。三月廿四日，共產黨人，在漢堡，佔據了市政府大廈。在萊不集，德萊斯敦，陝尼茲及德國其他各城，共產黨也進攻法院，市政廳，銀行及警察署。德共產報 *Die Rote Fahne* 公然提倡革命。在曼斯裴銅礦區，馬克斯·賀滋 (Max Hoelz)，一年前，在撒遜尼之富格蘭地會單人與柏林政府作遊擊戰的共黨羅賓漢，曾來宣佈他要負責一切行動。

同時，在德國各處，也爆發了許多炸彈事件，柏林之企圖毀壞公共建築物與紀念物，亦在其內，在這些動作中，政府承認了賀滋的把工廠作為堡壘。

暴動失敗了

不過，共產黨使這些地方化的行動協調的企圖，全部失敗了。他們的忠實的與受訓練的黨員，服從召集。他們被黨部拿去送死，一隊又復一隊，比魯登道夫在大戰中教軍隊去送死更無情些。大部工人，並不響應共黨來總罷工，也不參加共黨各處的零星暴動。四月初，暴動在各處都被制止住。

保爾·萊維 (Paul Levi) 博士，德共黨的領袖，自始即認為這種冒險是瘋狂的，被共黨開除了。

他通知莫斯科說，他們一點都不知道德國情形，因此，他們將幾萬工人生命，在一場血的賭博中犧牲了。他把布爾什維克領袖與共產國際負責人，稱作「流氓」與「低能政治家」。

三月暴動後不久，德國共產黨失掉一半黨員。至於馬克斯·賀滋，想以炸彈奪取權力的共黨煽動者，以一暗殺，放火，搶劫與五十餘其他罪名，被判終身監禁。

(未完)

專 載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十二月三日中華日報)

汪精衛

十一月二十三日，汪主席對日本軍宣傳主任幕僚會議列席官演講，題為「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茲特載全文於下。

各位先生：

今天有這個機會和各位講述三民主義，心裏非常高興。

三民主義的內容很廣，如今只能簡括的先說大概，再就其中一二要點，加以闡明。

二民主義的特質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博採歐美許多學說，然而它的本質，却是以中國固有的根本思想為根據的，和歐美種種學說，都不盡同。

例如民族主義，與歐美的國家主義不同。國家主義是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則產生在中國固有的和平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排外的意思。

民權主義與歐美天賦人權說不同，與歐美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同。天賦人權說所主張的是個人自由，而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則是全體自由，不是個人自由。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上著想，而民權主義則在政治上著想，質而言之，民權主義的目的，就是全民政治。

民生主義也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同。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會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是說一般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終極的目的而言，並不是說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孫先生在這一句話之後，緊緊的接着說：「

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看到尾，才可以明白了解。」從第一講以下，便將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共產主義不同的要點很明白，很詳細的指出來。馬克思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則主張階級合作，一個用暴力的方法，一個用和平的方法，這一點，完全不同。馬克思共產主義絕對廢止私有財產，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則在計劃經濟之下，一面發達國家資本，一面保護私人資本，這一點，又完全不同。

由此看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生主義——自有它的特質。和歐美的國家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全然不同。

為什麼孫先生要提倡三民主義？

孫先生為什麼要提倡三民主義呢？用意在那裏呢？

孫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就說，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以救國為目的，從救國的立場出發。歐美的殖民主義侵略中國，壓迫中國，使中國不能獨立生存，使中國不能自由平等，已經一百年了。三民主義就是要喚起全中國的人民，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侵略，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壓迫，爭取中國的獨立生存，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孫先生自從提倡革命以來，畢生精力，盡瘁於此。

民國十三年以後，孫先生看到歐美殖民主義之外，還有共產主義，爲慮於世，所以著述民生主義，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民生主義是在十三年間講演的，可惜尚未完畢，孫先生便與世長辭了。

十三年間正是容共的時候，然而孫先生當日對蘇聯的看法，和對共產黨的看法是不同的，對蘇聯認爲是友邦，對共產主義則始終認爲是國家社會亂之源，所以在民生主義的講演裏，特別指出馬克思共產主義的錯誤，使一般青年，信奉民生主義，不要信奉共產主義。

容共的本意就是要共產黨拋棄它組織，服從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拋棄共產主義，信奉三民主義。

十六年間，共產黨背信棄義，逆跡昭彰，中國國民黨決心清黨，把共產黨徒，清除了去，且進而痛剿之，這決心正是表現：中國國民黨始終守着三民主義，而與共產主義奮鬥。從此以後，反共精神，普遍全國，至今不渝，只有蔣介石，因爲西安事變，於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共產黨訂了密約，便背叛孫先生遺教，違反全黨公意，私行容共，可是，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之外，凡是中國國民黨的忠實同志，沒有一個人不是永遠堅守着三民主義而與共產主義奮鬥。

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第一個要着，在使中國從歐美經濟侵略，經濟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人們常常以爲中國只是一個半殖民地，但是，孫先生很痛心的說，中國簡直是一個次殖民地，不只是半殖民地。殖民地不過受一個國家的侵略和壓迫，中國却受着許多國家的侵略和壓迫，孫先生提倡革命，就是要使中國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做到自由平等。

怎樣纔能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做到中國的自由平等呢？

孫先生定下了兩個方案，第一是要中國自己努力，第二是要與先

進國的日本共同協力。

孫先生生時，中日關係，有過惡轉的時候，但孫先生對於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始終不變。孫先生也有批評日本的時候，可是，他的批評，總是期望日本與中國攜手爲友，不要與中國相對爲敵。這在民族主義講演裏看得出來。在其他與民族主義有關的遺教裏也都可以看得出來。試舉兩例以爲說明。

孫先生遺教中有一部「中國存亡問題」，是民國六年著述的。那時候，協約國勸中國和他們一起，參加歐戰。孫先生堅決反對，發爲此文，就中最重要的一段說：

「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美日以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爲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爲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設芥蒂。次之則爲美國，美國之地雖與我隔，而以其地勢，當然不侵我而友我。況兩國皆民國主義，尤可以相扶。中國而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其機會，必當借資於美國與日本，無論人才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於此兩友邦。而日本以同文同種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其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中國於日本，以種族論，爲弟兄之國，於美國，以政治論，又爲師弟之邦；故中國實有調和日美之地位，且有其義務者也。妄人乖忤之計，詎可信耶？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治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而於將來，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中國若循此道以爲外交，庶乎外交上召亡之因，可悉絕去也。」

孫先生之重視中日關係，其深切著明且如此。尤其要注意的，民國六年孫先生發表此文，正是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款之後，此

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謹慎深。所以贊成參戰，無非想在協商國勝利以後，藉其力量牽制日本。孫先生則不但反對參戰，並且說：「無日本即無中國，」我們知道，孫先生對於二十一條款，自然也是反對的，但是他認定冤仇宜解不宜結，所以始終期望日本和中國，彼此要作朋友，不要作敵人。對於當時反對論者，悠悠之口，概不介意，其所關切的，是趁着歐戰的機會，中日兩國，確立友好的關係，彼此合作，那麼，日本沒有對於中國之顧慮，發展更快，中國得到日本之援助，發展也易，並且更可以中日兩國之協力將歐美經濟侵略經濟壓迫的勢力。從東亞排除出去。這是民族主義的精髓，也是民生主義的精髓。

孫先生所顧慮的是，日本的處境既孤，中國的國勢又弱，所以盼望由中日的友好關係，擴而充之，做到日美關係的好轉，以確立中日美間友好的關係，而以中日合作為其前提。

三民主義與和平運動

如今就三民主義與最近的和平運動，再說幾句話。

這幾年來，中日關係日趨惡化，因為關係惡化，所以中國抗日，又因為中國抗日，所以關係愈見惡化，這樣下去，循環不已，沒有止境的。

到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中日關係才有一個轉機。

近衛聲明提出三個原則，一是善鄰友好，一是共同防共，一是經濟提攜。

就第一個原則來說，善鄰友好正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就第二個原則來說，共同防共，固然不是對俄，然而要防止第三國際的擾亂陰謀，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就第三個原則來說，經濟提攜，並不一定是對付那一個國家，而是以中日兩國的協力，發中日兩國的經濟力量，抵抗殖民主義的經濟侵略，經濟壓迫，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質而言之，目前中日和平運動的基本原則和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

以上就理論來說，至於實行呢，我感覺過去數年，中日關係惡化，在外交上國防上，彼此方針，背道而馳，我國民也只能枝節節節盡了一些努力，無補大局。我深深盼望這次和平運動，中日兩國能够從根本上做起，為中日關係劃一新局面，本於平等合作的精神，確立兩國一致的外交方針，國防方針，方針一致，則善鄰友好，可以做到，共同防共，可以做到，經濟提攜也易於着手了。

說到經濟提攜，有些人抱着悲觀的論調，我國民則以為中日兩國，實能誠意相處，平等相待，經濟提攜，定然有樂觀的前途的。就中國來說，今後經濟建設以民生主義為中心，民生主義的具體實行，以孫先生的實業計劃為根據，而其最大目的，一是發達中國的民族資本，一是要以日本的協力發達中國的民族資本，掃除買辦資本對於歐美之依賴，而同時使中日兩國在經濟上有平等合作自由發展的機會。也許中國方面，有人疑懼，在經濟提攜條件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發展。這是錯誤的。在日本方面，又或有人以為中國民族的資本發達，於日本不利。這也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知道東亞在歐美資本勢力支配之下，要不是聯合兩國的經濟力量，決不能與之對抗。然而中國的民族資本一日不發達，即中國一日沒有力量協助日本與之對抗，經濟提攜，何從說起。明白了這一層，便可以知道，本於民生主義，施行實業計劃，一方面發達民族資本，一方面掃除買辦資本對歐美之依賴，並以謀中日之經濟提攜，是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於整個東亞有利的。今日將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以及三民主義與和平運動的關係，簡單說明，時間匆促，只能舉其大要，然而三民主義的真諦也就於此可見了。

(完)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十二月九日中華日報)

周佛海

一般傳聞，先說中央政府，定於雙十節成立；以後又說十一月十二日 總理誕辰，一定實現；現在又說明年一月一日，必可成功。但是雙十節過去了，總理誕辰也過去了，中央政府並沒有成立。現在一月一日，也漸漸的快到了，中央政府的成立，還沒有一些動靜。於是種種的懷疑和揣測，到處可以聽得見。大家都以為汪先生組織中央政府的計劃，終於失敗了。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不能成功了。於是反對和平的人，就幸災樂禍的歡欣鼓舞，贊成和平的人，也就垂頭喪氣的悲觀絕望。汪先生的組府計劃，真的失敗了嗎？汪先生的和平運動真的不能成功嗎？組府計劃，就是這次運動的最後目的嗎？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利嗎？這些問題，都有研究清楚的必要。現在特述個人的所見。

汪先生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當然不是以組織中央政府的本身為目的。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個過程，不過是救國的一種方法。組織政府的本身，決不是目的。如果汪先生祇是以組織政府為目的，而不顧及國家的利益，老實說，我們老早已上了權了，那裏能等到今天，還在任人家的揣測和懷疑？我們也會聽見許多故意捏造的謠言；有些說，因為既成政權的反對，所以汪先生不能上權；有些說，因為日本的不同意，所以中央政府不能實現。但是我們敢放肆的說，如果我們只是為組織中央政府而組織中央政府，換句話，如果我們只是為取得政權而組織中央政府，再說得露骨一點，如果我們只是為個人權利祿位而組織中央政府，我們犯不着這樣的慘淡經營，艱難締造，老早已加入既成之局，樹立起中央政權了。我們堅決的主張和立場，乃是：如果中央政府的樹立，於國家沒有利益，我們情願終生亡命，決不冒冒失失的隨便上權；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於國有利，我

們是不避艱險，不辭危難，要挺起身來，擔負這個責任的。外面所傳雙十節，總理誕辰，以及明年元旦，都不過是揣測之詞。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決定。我十月間赴東京的時候，日本各方面，都以中央政府成立的時期問我，我答覆他們說：『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時間的問題，乃是條件的問題。如果條件足以救國，我們就立即着手組織。否則，我們是永遠不會組織的。』我告訴日本友人的這幾句話，現在再拿來告訴我們的同胞。這乃是汪先生的主張，這乃是我們的立場。我們先來檢閱組織中央政府，是否於國有利。

有些人說，你們的和平運動，我們是同情的。但是為什麼要組織中央政府？重慶政府，既然不能消滅，你們再來一個中央政府，不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年以前的西班牙嗎？不是要把外戰變成內亂嗎？不是上了日本人以華制華的當嗎？這些話驟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如果，抗戰的前途，確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是不應該組織中央政府的。如果重慶當局，能夠開始停戰，和平的交涉，（第三國調解或直接交涉，暫置不論。）我們的中央政府，也不應該樹立的。但是最後勝利，是絲毫沒有把握的。這個道理，我在『回顧與前瞻』和『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和今後的地位』兩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一個國民，那裏有不情願，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打勝仗的呢？但是事實究竟是事實，希望是不能變更事實的。重慶講和，現在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說蔣先生祇顧私人的權位，完全不顧國家的利益，我是不相信的。如果說他不明白和戰的利害，我是更不相信的。但是他的地位，他的環境，不容許他講和。所以他唱出要日本先撤兵，然後再講和的一種連他自己暗中都要好笑的超常識的議論。翻閱從古到今的中外的和戰的歷史，都是先停戰，再議和，然後再撤兵的。從沒看見先從撤

兵做起，最後纔做到停戰的。如果日本真的於停戰議和之前先撤了兵，那豈不是中國打了勝仗嗎？還要什麼和平交涉呢？重慶既然在這種超常識的空氣之下，那裏還準備議和呢？重慶既然沒有勝利的把握，又沒有議和的準備，我們就不能眼睜睜看着中國就這樣淪亡下去，而不組織中央政府來擔負這個和平的使命了。

我們深信組織中央政府，擔負和平的使命，於國家是「有利」的，最少的限度，確實是「無害」。

爲甚麼說有利？因爲由汪先生所領導的中央政府來議和，可以得到較好的條件。我們當然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憑利害，是不能以對人的好惡爲轉移的。但是人類總是感情的動物。感情的作用，並非完全不能影響國與國之間關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而出，爲中國挽救危亡，同時爲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可以使日本人感動。我兩次到東京和半年來和日本友人接觸的結果，深知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對於日本精神的影響，實在很大。日本民族，是富於感激性的，這是日本民族性的優點，我們應該認識的。他們既然是富於感激性的，所以他們以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不願生死，出而主張和平的汪先生爲對手來議和，和以與他們惡戰苦鬥了兩年以上的重慶政府爲對手來講和，心理上，情緒上，是完全不同的。因爲有這個不同，所以他們對於重慶政府所要求的必多，對於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必較少。這從日本民族的特性來看，一定是不會錯的。這還是從理論來說。根據我的體驗，事實也是如此的。我是奉命任外交折衝的。我以前雖然沒有辦外交的經驗，但是我深感覺這次我們和日本折衝，和普通的折衝，完全不同。普通的折衝，是只替自己打算，不爲對方設想的。這次我們的折衝，固然雙方都爲自己的國家打算，但是同時雙方都互相爲對方設想。我在交涉之初，就對日本同志表示，我們此次交涉，雙方都要有種特殊精神。就是日本不能以戰勝國自居，中國不能以戰敗國自處。如果日本站在戰勝國的地位，自己爲刀鋸，而以中國爲肉，我們是受不了的。如果我們受不了，和平是沒有希

望的。同時，中國也不要忘記喪了許多師，失了許多地，實際上是打敗了仗的。如果打了仗，還一點點虧都不肯吃，和平也是沒有希望的。日本不要以戰勝國自居，就是不要向中國要得太多，不要使中國吃虧太大。中國不能不以戰敗國自處，就是不能不多送給日本一點，不能不多吃一點虧。如果日本能以軍事力量，完全滅亡中國，或者中國能够以軍事力量，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那乃是另一問題。如果兩者都不可能，上述的精神，中日雙方，都要具有，然後和平纔能成功，纔能永久的。我們的折衝，便是根據這種精神。所以日本向我們要求的時候，他們常常爲我們設想，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條件，新中央政府是不是還站得住，是不是還可以見諒於國人。我們拒絕日本的要求的時候，我們也常常爲他們設想，如果連這一點我們都不答應，日本的國民，是不是會反對他們的政府，是不是要使他們發生內政問題。像這樣一方面爲自國打算，比時互相爲對方設想的精神，假使東京和重慶講和，一定是不會有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講和的條件，一定要比較苛刻，中國的損失，一定要較多較大。因爲一個是以友好的精神來交涉，想從這個交涉之中，得到公平的和平，一個是以怨恨的精神來交涉，想以交涉的條件作報復的手段。這個區別很重要，只要是冷靜觀察的人，一定可以認識的。

我們因爲以上述友好的精神來折衝，所以雖然常常也逢着難關，遇着暗礁，但是都不是沒有方法去解決的。現在雖然還沒有達到最後決定的階段，但是就交涉經過的大體說，雖然還不能令我們十分滿意，但是恐怕不是重慶政府交涉時所能得到的。日本雖然略有所得，中國雖然準備略有失，但是中國所準備的失，決不致妨礙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的。談判的條件，雖然在最近的將來，還不便全部公佈，但是我可以負責的保證，除非中國真正得到最後勝利，就是重慶來講和，至多也不過只能得到這樣的條件，恐怕連這樣的條件也得不到。這決不是欺人之談，我們對於歷史，要有交代的。我們不是喪心病狂，難道願意天下後世的人，爲我們鑄鐵像嗎？

我相信一定有人說，條件雖然很好，但是等到你們上檯之後，有甚麼方法，保證日本有誠意，有什麼力量保證日本能實行？這個問題，當然是應有而必有的。不過我覺得這也不是毫無把握，至少比最後勝利的把握要多得多。

據我半年來實際的體驗，我覺得至少日本的當局和在野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別的不說，就是就這次條件的會談來說，也是一個證明。前面已經說過，這次會談，是以友好的精神來會商的。但是雙方關於利害所繫，得失所關的地方，爭執依然很烈。雖然爭到最後，雙方都以友好的精神，尋覓公平的解決，但是爭執的時候，雙方都絲毫不肯放鬆，因此要耽擱了許多時間。我就是從日本爭執得很厲害之中，看出日本將來能夠實行的誠意。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本來預備不實行的事情，何必費氣力去爭？反過來說，就是因為將來不能不實行，所以現在不能不認真地爭。就日本現在的情形來看，是希望中國的中央政府早日成立的。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儘管我們現在要甚麼，他們答應甚麼，我們怎樣說怎樣好，把我們早點騙上檯，等我們上了檯，他們再來變臉。這樣做法，有何不可？但是他們現在並不如此。因為雙方都很認真，所以就不能不多要時間，因為多要時間，他們希望早日成立的中央政府，就不能不因此延遲下去。他們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一方面條件又要認真商討。因為要認真的商討條件，齊肯讓切望早日成立的中國中央政府延遲。可見得這次所談的條件，他們是準備將來實行的，決不是現在拿來騙我們上檯的把戲。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如果要根本懷疑，只好一直打下去，永久不來講和。如果終有一天要講和的話，我們便一方面不要使人懷疑我們的誠意，同時我們也不要懷疑人家決無誠意。至於說由新中央政府來講和，恐怕日本人沒有誠意，難道由重慶政府來講和，日本便立即變成有誠意嗎？我們決不是和重慶政府，爭着講和，然果重慶政府能夠講和，乃是我們馨香禱祝，求之不得的

事情。我現在只說，如果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那末，只好一直打到底，新中央來議和，他們固然沒有誠意，重慶來議和，他們也決不會有誠意嗎？如果日本有誠意，那末，在重慶不肯議和的現在，新中央政府來和日本議和，我們何必多顧慮，多懷疑？固然，我對於日本將來實行條件，不是絕對樂觀的。我前面說過，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但是日本除却上階當局之外，還有各級人員；除却無識之士外，不明白的人還多。將來執行條件，全在他們。他們無誠意，我現在不能確實的答覆。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將來履行條件，是要遇着許多難關或阻礙的。至少一定會使人感覺得不痛快。不過只要他們的高級當局有誠意，一定可以督促他們中下級人員去實行；只要有識之士有誠意，一定可以教育一般不明白的人民使他們明白，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是絕對悲觀的。自從甲午戰爭以後幾十年的血債，要一筆來勾銷，真是談何容易。這種劃時代的歷史事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然有許多困難，要我們去克服，有許多障礙，要我們去突破的，那裏能夠看見前面的險阻艱難，便望而却步呢？

再說我們有什麼力量，保障他們履行條件。抗戰如果最後能得最後勝利，那是另一問題。我現在要問假使重慶來議和，會有什麼力量來保障。我想不外兩種：第一，是托英美出來調停，用國際力量來保障；第二，整理和充實軍備，用軍事力量來保障。這兩種保障，都是靠不住的。國際的力量如果有效，國聯歷屆關於中日關係的決議，老早應該發生效用了；九國公約老早應該把中國救起來了。如果要靠國際的力量，來保障日本履行條件，不是欺人，便是自欺。三國干涉還遼的事，是不能重見於今日的。軍事力量，也够不上保障。拿軍事力量來保障，不外說日本如不履行條件，我們再來打一仗。現在因為打了仗，纔來講和。如果再打一仗，還是要打敗仗。如果日本沒有誠意履行條件，當然他們也是不惜再戰，不怕再戰的。所以以為只要我們有了軍事力量，便不怕日本沒有誠意，便可以保障條件的履行，那也

是靠不住的。

然則我們一點都沒有保障嗎？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保障的力量，超過國際的援助，還勝於百萬大軍。這個力量，便是精神的力量，便是決心。

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是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的，是以國家的利害為轉移的。如果上權之後，日本不能履行條件，我們會全部撤退的。「條件不履行，我們就不幹」。這乃是我們的決心，這乃是我們的保障。這個保障的力量，是非常偉大而雄厚的。有人說，你們上權之後，恐怕就想不幹也不可得。這話我不相信。幹的自由，也許不充，不幹的自由，我們是充分的。固然，在沒有撤兵之前，我們是在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的，但是我們只要有不怕死的決心，我們是充分的有着不幹的自由。最大的限度，也不過把汪先生以下的同志，全部捉去殺死。如果我們怕死，我們也就不會離開重慶了。老實說，我們這般革命黨徒，都是窮光蛋出身，決沒有患得患失的觀念。我們都是劫後餘生，雖不敢說視死如歸，至少人家是不能以死來威脅或挾制的。所以如果日本不履行條件，我們是決心拂袖而去的。這個決心，汪先生和他的幹部，都是很堅強的。我相信日本決不會這樣沒有誠意。萬一如此，我們便自認瞎眼，向他們說一聲「撒約拉拿」，叫他們另請高明去合作。日本如果有心有力來滅亡中國，那是另一問題。如果既無此心，更無此力，就不能不和中國合作。要和中國合作，就不能不使中國國民相信日本有誠意，相信日本不是帝國主義，相信日本尊重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拚着生命出來主張中日和平和中日合作的。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誠心誠意的要實行中日合作的，像這樣具有堅強信念和充分誠意而且拚着生命來為中日合作而奮鬥的汪先生，日本尚且不能和他推誠合作，以後還有誰相信日本的話，還有誰敢同日本共事？如果到了這個情形，日本怎樣辦？是不是去找一般失意之徒，無聊之輩，來替他們作爪牙，為他們供驅使？如果

這樣，這般人是不是能得國民的信仰，能得國民的擁護。如果不能，他們是不是有力量和日本協力，來解決中日的糾紛，來收拾目前的時局？如果不能，日本還有什麼路可走？所以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說，忠實的履行條件，不僅在道義上應該如此，就是在利害關係上也應該如此。因此，我深信我們這種精神上的保障，比較百萬大軍的力量要大得多。不待說，將來不如意，不愉快的事，必定很多，我們決不是今天說不幹，明天說下權。我們的幹不幹，不是個人出處問題，乃是國家的利害問題。我們不輕易上權，同時當然也不會輕舉妄動的隨便下權。但是等到我們盡了心，竭了力，忍無可忍，為無可為的時候，汪先生是會領導他的同志，勇退的下權的。

以上是說組織中央政府於國「有利」。就是退一萬步說，至少也於國「無害」。因為如果組織了中央政府，會使中國比較現在喪失更多，犧牲更大，那當然是有害的。我們現在姑且不論因為新中央政府之產生，會使中國喪失較少，犧牲較小，但是絕對不會因此喪失更多，犧牲更鉅。如果喪失和犧牲，都不過和現在一樣，新中央政府的成立，那裏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換句話說，照目前的狀態看，新中央的產生，那裏會於國有害。

如果我們在重慶統治的範圍之內，樹立起中央政府，和共產黨在重慶統治的西北，樹立起西北邊區政府一樣，或者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或者足以促成重慶的崩潰。但是我們現在要組織中央政府的地位，是已經丟掉了兩年的地方。我們不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不會使抗戰勝利；同時也不會因為我們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就會使抗戰失敗。抗戰的失敗，抗戰之得不到最後勝利，另有其他的原因，和我們組織中央政府，沒有甚麼深刻而密切的關係。不待說，將來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是有許多人民和軍隊來歸的。表面上這似乎是撤重慶的台。但是這乃是人心思和將士厭戰的表現。這種根本的精神的原因，會使軍隊和人民，傾心於新中央政府的。如果蔑視了這種一般的

心理，而歸咎於新中央政府的組織，那便是抹煞事實的議論。因為如果人民不思想和，將士不厭戰，新中央政府，是不能取得一般的同情的。然則在現在這樣事實和心理的狀態之下，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甚麼害處？

再從對外的關係來說。我前面說過，這次調整中日關係，我們是不能不多吃點虧的。但是我們進一步來研究，事實上，我們是送東西出去，還是收東西回來？老實說，我們是收東西回來的。固然，這些東西，原來是我們的，但是現在已在人家手中了。如果我們不能以武力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這些東西，仍舊在他們手中。我們豈在沒有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的把握，那末，這些東西，永久就會在他們手中。我們現在却要從他們手中，把這些東西拿回來。雖然在事實上，沒有全部拿回來的可能，但是總是要努力越多拿回越好。所以與其說我們送掉多少，不如說我們拿回多少。我們假定今後不能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而拿回一些東西，但是至少決不會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比現在還要更送得多。因為東西本來已在人家的手中了。而我們是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送。所以中央政府的成立，即使於國無益，那裏會於國有害？最大的限度，也不過和現在一樣！

我們不是以國事為兒戲的。我們會經再四考慮組織中央政府的得失利害。我們深覺組織中央政府，是必有所得，是必然有利。最低的限度，也是萬無所失，必然無害。不戰不和的局面，是沒有生路，只有死路的。我們組織中央政府來調整中日關係，是從死路之中，打開一條生路。如果這條生路打通，我們就可以達到生的目的。萬一此路不通，至多也不過仍舊死而已矣，決不會在死之上，再加一層死。本來也就要死的，如今也不過一死而已。我們深思熟慮的研究了利害得失之後，總決心準備組織中央政府。我們沒有喪心病狂，那裏願意犧牲國家的利益，來爭權利，逞意氣！

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政府的對立，一個時候是難免的。但是

如果我們所得的條件，不妨礙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而這些條件又能逐步的切實實行，我們抗戰的目標就已達到，抗戰的原因，就已消滅。抗戰的原因，既然消滅，誰還願意去打無意義的仗，誰還願意去為無謂的犧牲？不待說，在短時期內，因為重慶方面的言論統制和暴力壓迫，人民不能認識事實，不能了解真相，不敢發表真正的主張，不敢採取正當的行動。但是過了相當的時期，等到人民了解了真相之後，他們的輿情，無形中是會逼着重慶政府和中央政府合併，而使中國統一的。我是從重慶出來的。我深知除掉極少數的人員外，大多數軍政當局，誰不希望和平。他們所顧慮的是條件太苛刻，日本靠不住。這種顧慮，只要是愛國的中國人，當然是應該有的。如果以事實來表現條件不苛刻，日本有誠意，誰不願意中國的統一。至於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當然不會因為個人的祿位和權利，而不歡迎兩個政府的統一的。現在聽說有些人埋怨汪先生的門關得緊，甚至說他的左右，尤其是鄒人包圍先生，閉塞賢路。這種推測，真是太無價值。我們認為參加和平運動，主張中日合作，乃是義務，乃是責任，決不是權利。這種神聖的義務和偉大的責任，當然歡迎許多人來負擔，那裏是少數人所能完成。所以重慶方面，只要是和我們主張相同的人，我們是極端歡迎的。民國十六年，有南京和武漢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民國十九年，也有北平和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併存，後來都統一了。雖然過去是純粹的內政問題，現在參有外交的關係，情形不完全一樣；但是政治的演進，是千變萬化的。半年以前，誰能夢想國社黨和共產黨會合作？但是德蘇居然攜手了。國與國之間，尚且如此，同是中國人，難道會永久不化除成見嗎？不過我所希望的，就是不要把政策的異同之爭，變成個人的恩怨之爭。人生數十寒暑耳，一棺付身，萬事皆了，大家為甚麼不以國家為重，而流為個人的意氣之爭。說到這裏，不禁要說幾句題外的話。我們的特務同志和重慶特務份子的爭鬥，是我們極痛心的事。我們是主張中日和平的。現在和平沒有成功，自

已却先互相殘殺起來了。這那裏是我們願意的事。這個責任，重慶是要負的。我們沒一個人到內地去謀殺任何人。但是重慶却派人到河內去暗殺汪先生，派人到香港，上海來暗殺我們的同志。我們的行動，是完全出於自衛的。重慶的這種行動，除却爭氣以外，我不知道對於大局究竟有甚麼好處？萬一汪先生不幸，就遭暗算，他的同志，只有加緊努力，實現他的主張的，和平運動，決不會絲毫停頓。其他任何人被暗殺，更不成問題。所以重慶即使能够暗殺一兩個人，除却逞一時之氣，快一時之意外，於事有甚麼好處？不僅如此，重慶派來暗殺我們的人，都先後參加和平運動，而為我們的重要幹部了。僅就這一點，也足以促重慶方面的大澈大悟。所以這種個人意氣之爭，實在太無意義，太無價值。只要大家都以國事為重，黨氣為輕，我不相信對立的局面，是會永久延長下去的。即使有少數的人，徒逞私人的意氣，在時代的要求和民衆的指摘之下，他們是不會長久存在的。所以我對於中國將來的統一，不但不絕望，而且不悲觀。這個觀察，不僅根據哲學的推測，而且是根據科學的分析的。

政治建設

(十二月十七日中華日報)

褚民誼

「和平」，「反共」，「建國」；這是和平運動的中心工作，所謂「和平」，「反共」是和平運動的方式，「建國」才是和平運動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建設一個和平的國家和非共產主義的國家。但是有人以為努力和平與反共是已盡了責任，實際是不夠的，因為和平只是建國的必由途徑，反共只是掃除建國的障礙。拿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做例子：辛亥革命之前，大家很努力於推翻滿清政府，拚命的完成了辛亥革命，以為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沒有注意到我們該建立一個怎樣的民主國家。因之民初的國是依舊很糟，總理眼看著悲傷心痛，提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格言，更以國民革命為

以上把各種懷疑，都加以解釋了。最後說到中央政府，甚麼時候可以成立。中央政府，不如重慶所宣傳，是失敗了；也不像外間所傳聞，是停頓了。既沒有停頓，更沒有失敗。我們正在積極的進行着，就是正在和日本談判條件。前面曾經說過，如果條件不能保證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我們是不會幹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快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的中國救起來，如果條件不能使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何必組織中央政府？難道真的要漢奸嗎？但是條件不是能圓滿？我是當交涉之衝的人，我深知雖然還有兩三個具體問題，雙方意見，還沒有完全一致，但是雙方都是以友好的精神來研究，所以意見的漸漸接近，乃至於完全一致，不單是有可能，而且為期也不遠了。只要條件全部談判完成，中央政府，就可立即組織起來，以擔負實行這些條件的神聖使命。

總結的說：組織中央政府，是於國家有利益的。組織中央政府，一定是成功的。組織中央政府，為期是不遠的。全國的同胞，一致起來擁護新中央政府完成他的神聖使命。

工作的目標，因之有十三年的本黨改組和民十五年的出師北伐，國家有了一個新的生命，民族革命到了一個新的階級。直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擴出了陰謀險惡，不知祖國的共產黨以後，大家又以為革命成功了，一般同志把目光轉移到做官，爭權，奪利，營私上去，表面上有了一個新的政府，實際上沒有新的性質的國家。以黨治國變了獨夫治國，黨部變了獨夫的衙門，獨裁政治拾了頭，民主政治依舊沒有實現。本黨汪主席繼承了總理遺志，雖然用盡了種種方法，一面喚起同志和國人的覺醒，一面設法使獨夫政策有所改變並糾正他的錯誤，但是獨夫沒有國是，只有私利；今日可以反共剿匪，明日可以聯共

解釋，結果把國事當兒戲，釀成了這一次空前的戰禍。現在和平運動已開展到全國，獨夫的「倫和」，「玩和」已為全國人民所厭惡，和平運動的成功雖然已無疑義，但是我們如果把政治建設忽略，把政治建設的內容不注意，那就會踏過去歷史的覆轍，建國就會不能成功，這樣，和平運動的勢力也就付諸東流了。

那末，我們應如何建國呢？我們應如何注意建國的內容呢？

我們說過，和平運動的成功只是建國的前提，不和平就不能建國。建國的內容我們可分為四：（一）政治建設，（二）經濟建設，（三）實業建設，（四）國防建設。政治建設是要奠定行政的基礎，經濟建設是要奠定社會的基礎，實業建設是要解決民生問題，而國防建設乃是解決民族的生存和東亞永久和平以至全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現在提出的是政治建設。

第一，我們要注意到建國的原則是要實現民主主義，換句話說，是要實現民主政治。民國成立已二十八年，為什麼還要談這問題，因為顧名思義，中華民國應該是十足道地的民主的；但是二十八年的民國只是形式而不是實質。辛亥革命把滿清推倒了，但是袁世凱的專制政權出現，民主政治無法開展。袁世凱的專制政權推倒了，自北洋軍閥的割據局出現，表現着封建殘餘勢力的存在，議會等於虛設，行政官只是軍閥的附庸。從民國五年直到民國十五年，國內始終在軍閥火併的狀態之下，民主政治不但無由開展，簡直可以說是談不到。不過這十年來軍閥的火併有了一個結果，這結果就是由於民族的覺醒，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終於把封建殘餘的軍閥政治推倒了。軍閥政治打倒之後，國民政府奠都於南京；論理民主政治該實現了，因為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為骨幹的，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中心思想是民主，而總理所手訂的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以及全部遺教無一非民主思想為出發點。但是國民政府奠都以後，首先所遭遇的是共產黨的陰謀被發覺，不得不從事於清黨。其次所

遭遇的是蔣介石獨裁政治的抬頭，內戰就隨着而發生，這時期的內戰，我們可分為三方面，其一是為民主政治而奮鬥，其二是異己勢力的壓倒和排除；其三是共產黨的搗亂。這些情形雖然和軍閥火併不同，而打擊民主革命，使民主政治無由實施，顯然是令人痛心的事。實則史太林和蔣介石是同樣的要實現獨裁政治的，所不同的，前者是以無產階級獨裁為幌子而以共產黨做招牌；後者以是建國大綱程序中的訓政為幌子而以國民黨做招牌。這二個獨裁主義者始終不能相容，其所以常常「神離」而「貌合」，就因為各自要達到其目的的一種過程罷了。所以，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要打倒獨裁，打倒獨裁，尤必須反共。史太林在歐洲的假民主的西洋鏡已經拆穿了，蔣介石的訓政——獨裁者的變相——的西洋鏡也拆穿了，不過史太林的西洋鏡尚沒有把俄國弄糟，而蔣介石的西洋鏡確把自己的國家遭遇着滅亡的危險和禍害。因之我們主張和平，主張反共，盡為了實現民主政治，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起見，不能不把建國的障礙掃除，才後國家可以確立，民族可以永久的生存。

其次，我們要注意到建國的原則是要「以黨建國」。中國國民黨所負的使命是完成國民革命和以黨建國。以黨建國有三個秩序，第一是軍政時期，第二是訓政時期，第三是憲政時期。軍政時期是掃除建國的革命的障礙，訓政時期是訓練人民行使五權，憲政時期還放於民，然後所謂「以黨治國」的目的可達。但是以黨建國的原意是在以黨的力量來從事建國，並不是以黨來包辦建國事業；以黨治國是以黨義即三民主義來治國，並不是一黨專政，更不是以黨人來治國。上面說過，國民黨黨人以往在每一次革命到了某一階段時，都存了做官思想，做官之後又走入了爭權奪利的路上去，這些現象不但在黨外的人看來只是黨人治國，或是黨人專政而已，在實際上看來那不但削弱革命的力量，而且妨礙主義的實現。黨的力量削弱了，主義的實現過程受了挫折，那如何能運用一切黨外的力量來建國呢？至於蔣介石更變曲本

黨的主義和建國程序，把軍事作私人權力的基礎，社職當獨裁的好機會，『憲政』二字更沒有在他眼裏。如此，蔣介石歪曲的作爲，決不能認爲國民黨的罪過，因爲黨的真實意義並不爲人所反對，僅是一部份黨人的弄壞罷了。所以我們從事於和平運動，不但要挽救國家於存亡危急之秋，且要積極使我民族永久生存於世界，建設真正民主的政治，實現三民主義的真諦。我們以此爲出發點，乃有初步的復黨行動，在汪主席正確領導之下，鞏固黨的基础，並聯合各黨各派的力量，完成建國的使命。

這裏，我們須特別指出，今後的政治建設應致力於憲政的實施。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的解放與國家的自由與平等，國民黨全部奮鬥的歷史在求憲政之實施，唯憲政之實現才後民族國家得趨於強盛。建國大綱所定的三個程序是連帶性與整體性的，任何政策不能把牠分割的，如果把牠分割來看，或是分割來作爲政治設施的出發點，那就陷於絕大的錯誤。蔣介石拿軍政時期來當爲支配政治的工具，是失去了軍政時期掃除革命障礙的真實意義，拿訓政時期來當爲獨裁政治的工具，是失去了訓政時期使人民了解參加政治的真實意義，結果，反革命勢力不但在軍政時期已抬了頭，而自食都南京以後，人民始終無置喙於政治的餘地。十幾年來，每次內政問題的糾紛與鬥爭：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完全在反對軍事力量支配政治，政治力量支援個人的過程之中。但是蔣介石一面實行獨裁，一面却把憲備憲政，結束訓政來騙人，所謂國民會議，在戰前似乎又具體的籌備國民大會；這些會議都是得不到甚麼結果，只是玩弄權術來籠絡，等到人家入了彀，然後打倒人家，消滅人家。所以我們對於這些事實，使人萬分痛心，他何嘗籌備憲政，他心中毫無有憲政思想，更沒有容許憲政的可能。一個對外問題發生時，他就把『憲政』『民主』來使真正民主勢力無用武之地，一個對內問題發生的時候，他就把軍政訓政二名詞來壓制，十餘年來始終在軍政訓政二個時期交替地把口號用着，戰後的國民參政

會更可以看出『掛羊頭，賣狗肉』的事實。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如下的一段：

「本屆大會檢討國民參政會成立以來之結果，彌覺有名無實，蓋個人獨裁變本加厲，中央同志已無討論之自由，國民參政會形同虛設，亦固其所，且即以國民參政會之稱權而論，亦未能舉參與大計之實，本屆大會特鄭重宣布，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中全國人才之效，並鄭重宣布，除共產黨外，凡屬人民，皆當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負擔收拾時局之責任，而尤切要者，則戰事既息，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已無延期之必要，務於最短期間使全國和平得以實現，國民大會得以召集，憲法得以制定頒佈，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階級。」

上面這段話，可知本黨對於憲政的重視，更可知建國大綱的三個程序實以憲政時期爲最重要。所以我們要集合一切民主主義的力量，除了共產黨及一切獨裁主義者之外而來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際此國家存亡危急之秋，我們固不應把建國程序忽略，而要緊握着建國程序的中心問題，而現現在集中全國志士，爭取民族國家生存的時候，要在『大綱』之中爭取『幸福』的時候，只有排除一切專制獨裁的任何政治方式，和平才得實現，國家才得統一，也只有真正民主的和平統一才能使民族生存於永久。

其次，我們要注意到實現民主政治就要實行民主集權。本黨憲政之目的在實現民主政治，所以有『還政於民』的政綱。但是民主政治的方式，必須採用集權制度才能使獨裁政治根本消滅的代議士制度的弊病得以消除。現代國家有二種現象，第一是政治能支配軍事，如英法美等國不但國強而且能支持世界和平。第二是軍事支配政治如德意

等國雖然也是相當的強盛，但因在獨裁政治之下，所以破壞了世界的和平，激盪着世界戰爭的波浪。至於蘇俄，更當然是天宇第一號的獨裁者，這獨裁者惟恐天下不亂，但軍事力量確在黨的支配之下，蔣介石呢？則以軍事獨裁支配了黨和政治，我們知道，唯和平是理智的行動，而獨裁是瘋狂的行動，在一切落後的我國，在一切基礎沒有穩固的時候，我們能不以理智而瘋狂嗎？一個強盛國家的瘋狂行動是侵略，一個弱小國家的瘋狂行動只有死，只有滅亡。我們還記得從前汪主席在『權與能』一文裏，曾經引用總理權能的例子闡明原理，其大意，政治動向的決定是由於黨和政府，軍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而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黨和政府是『權』，而軍事只是能力的一部份，如果政治不能支配軍事，尤如開汽車者不遵坐汽車者所命的方向一樣，結果必然是不能達到原有的目的。所以我們要做到總理遺教，使政治強於軍事，不使政治軍事的原因到置而做到真正的民主，那就不能不運用民主集權制度，然後政治可以有力量，行政效率得以增加，社會民生得以安定。

上面所說只是簡單的說明，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以民主集權來消滅一切以軍事獨裁為中心的歪曲辦法。此外，我們要簡單的說明民主集權並不和法西斯一樣。現在有些人固然反對共產主義，但對共產主義必得服膺法西斯，這尤如『飲鴆止渴』。更有些人以為法西斯精神是值得欽佩的，如果把法西斯精神施之於民主集權制度內，政治效能定然是增加的，這尤如蔣介石把法西斯組織來作為國民黨的中心，其結果，人民寧願法西斯因而也厭惡國民黨，只知藍衣社的力量則不知有一民黨的力量。蔣介石把法西斯來辦黨是獨裁政治出現的方式，不但使國民黨變了質，甚至把三民主義也曲解了。法西斯是獨裁的，民主集權是基於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今後政治建設，當然不能再使國民黨和三民主義變了質。至於共產黨的精神，也何嘗不能使人欽佩，只是牠既不與三民主義相容，又不與民主政治相合，所以反共不單

是反共產主義，且是反獨裁的。法西斯與共產既同為獨裁，如何得與民主集權相提並論。再則，法西斯崇尚武力，三民主義是基於中國的民族性，崇尚和平；法西斯是偏狹的國家主義，而三民主義不但要獲致東亞和平與世界和平，進而要實現世界大同。所以，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治，更不同於共產主義的假民主政治，自與法西斯很大的區別；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特別認識的了。

依哲學的原理，人類是政治的動物。政治設施必須根據每個國家的民族性和社會組織的基層特點，基此產生政治制度。三民主義有獨特的哲學基礎和社會基礎，一切不合於中國民族精神的制度，決不能適切於實際的需要；近年來，許多人把各種制度或是各種主義的精神，搬到中國來用過，但是大都歸於失敗，不但失敗而且更糟；這就是沒有認識三民主義的真實性。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就是根據三民主義的原理來發揚中國民族的偉大的和平思想和東方道義的精神。和平運動是基於總理遺教的一個劃時代的運動，尤其是中日和平以後的分担世界和平的責任與合作；我們必須致力於政治建設，適應這偉大的時代的潮流，奠定民族萬世之基，永垂東亞和平不朽之偉業。

歡 迎

批評，定閱，
介紹，交換。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五日)

本刊在二十八年內出至十八期為止，一周大事述評因故暫停了一期。本期問世正是二十九年元旦，本刊也與歲更始，結束了舊的，開始了新的一頁。回溯過來半年來，在國內是一方面繼續其無底又無效的戰爭，一方面是冒險，排萬難從事救中國救東亞的和平運動。和平運動的目的現在雖然尚未實現，可是和平運動的意義和價值，已為一般人所瞭解，所相信，和平運動的工作也漸為一般人努力的標的。這一次的和平運動，不僅是洗滌幾十年來中日間的仇恨，結束兩年多的慘酷戰爭，還要中日兩國共同攜手，內則完成現代中國的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的責任。這個工作是艱巨的，使命是重大的，而從事和平運動者的態度與精神則是堅決勇敢的。由於我們的態度堅決，精神勇敢，所以我們能不顧一切危險，不顧一切利害，從事於救中國救東亞的和平運動。同時也因為和平運動是救國的，凡是有違反我們救國目的的條件我們全不接受，因此儘管三番兩次的謠傳我們就要成立國民政府，新的政府至今尚未成立，或者友邦人士希望我們趕快改組國民政府，以解救他們因中日戰爭而來的困難，或者我們全國的民衆，希望我們早些改組國民政府以拯救他們因戰爭而受到的痛苦。可是我們的和平運動的領導者及其同志，仍是堅定，沉着，不為一時的得失行動，我們多方呼號，多方磋商，希望能在國內樹立起健強的救國力量，在國外使友邦人士明白中華民族自求解放，自求平等自由之迫切。必須如此，才能够樹立起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够有獨立自主的行政。在政府成立以前固然要努力獲得有利的條件，在政府成立以後更要加緊努力，期能使所獲得的條件具體實現。汪先生說：「我對於和平運動，是勇往直前的，如果果見其成功，固然是國家之福，不幸

失敗，亦必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種子，因為中日兩國如果要共存共榮，終不能不向這條路走的，何妨由我來做這條路上的一顆石子，一粒泥沙。」大家都抱着這種決心，和平運動的目的就會實現的。

半年來的國際情形可謂極盡其風雲變幻之大觀了。八月間德蘇訂立友好通商條約及互不侵犯條約，九月初德波戰爭便爆發了，跟着來的英法對德宣戰，蘇聯乘波蘭之危進兵波蘭東境，佔去波蘭半壁，戰後新興的波蘭國便在德蘇攜手之下重遭瓜分之禍。波蘭亡後，德國移師西向，對付英法，蘇聯便在東歐的幾個小國中伸其魔手，終於發生蘇芬的戰爭。英法對德的戰爭成了不打不和的相持之局，蘇芬戰爭一時又難得結束，大半個歐洲在炮火中渡新年，目下繼續的歐洲炮火恐非短期間所能終了。

由於德蘇的攜手，國際上無復陣線論的怪調，蘇聯——自命為和平柱石，已為國聯開除會籍了。這像徵是英法於對德之外，不惜反蘇，以結歡歐洲其他小國。蘇聯在歐洲的侵略，引起美國極大的反感，報載美英法將結戰反蘇陣線不是沒可能的。蘇聯的善變真有些令人難得思議，從前唱的英美法蘇的所謂「和平」，所謂「民主」陣線，現在將變為英美法共同對蘇了。共產黨你們在此地有何話說，英美法是仍舊是和平陣線，民主集團，蘇聯是否已變為侵略的前驅了呢？同時德蘇的結合既不自然又不穩固，又有義大利拉住德國的腿，將來各國聯合對蘇不是沒有可能的。

日本在東亞由反英法，漸變成和英法。現日本對英法美的外交俱極活躍，對德義的關係已不若前此的密切。英法於對德蘇之外決不肯再開罪日本，日本在這個機會中可以獲得英法的讓步的。同時美國也沒有單獨對付日本的力量，美日商約的廢止，不過是美日促成美日談判的手段吧了。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止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 注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三民主義之發達，及當前政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係之研究，無論者譯皆所歡迎。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標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照樣清晰繪寫。
- 三、譯稿須將原稿寄來，或請註示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月日及地址。
- 四、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須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六、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四元至十元，譯稿酌減。
- 七、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與真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八、來稿登載與否，不能以元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食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九、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二六號。

三民週刊定價表

全年	半年	三月	一册	冊數	定價	國內郵資	國外郵資
二元	一元一角	六角	六分	一册	六分	一分	五分
四角八分	二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分	一册	一分	一分	五分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六角	六分	一册	六分	一分	五分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五九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三民週刊 第二卷第一期
零售每册國幣六分

編輯者 三民週刊社
出版者 三民週刊社
定售處 上海郵局信箱1326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中華日報

消息 正確

言論 公正

中華日報館地址：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電話：九二五二
掛號：六一一〇
郵政特准掛號優待寄送

▲中華日報價目▼
▲本國及日本每月國幣一元半年國幣五元五角全年國幣十元
▲香港澳門每月國幣貳元
▲歐美南洋每月國幣四元

中宣部登記證：中字第一〇八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三三號
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第一二五二號
法租界許准證：A-四〇一二

當今唯一權威言論

中國公論

第二卷三期十二月號
業於一日出版了！

▲定價三角▼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要目

社論：和平救國運動的前途
英德軍與國際政局
蘇聯與青年出路
中國經濟的過去與將來
黎錦熙先生評傳
答國中諸君
戰前德國軍事與經濟準備
經濟提議與發展中國產業
復興農村應提倡生產教育
世界趨勢與我國大學之使命

歐美現代之實在論
和平運動中日民族之認識
國際述平
中國小說與駢文之關係
題書文學之發展
文學的脫化時代
嵩嶽游記
老殘與清廉
永恆的回憶
慘痛的回憶
平靜的心

還鄉錄
夜夢
生命別
送別
路命
生門
靈芝
白門舊事詩
飛鳥詩
西北拾零

注意：本刊第一卷精裝台訂本已開始出售，每部定價貳元五角，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新世紀

半月刊

論 壇 專 載

組織中央政府問題
歐洲局勢的新醞釀
蘇俄侵略芬蘭
日蘇間的交涉
國聯盟約的真義
消耗戰與游擊戰
民國以來土地制度的改革
桂林商會的公益日會

力 薈
歐陽子櫻
切 膚
羅明揚

第十二期目錄

著 史 料

致汪精衛先主書 西園寺公一
中國局勢及和平運動 橫田實
蘇俄與德國 Charles E. Grutke
日蘇交涉之經濟因素 John Ahlers
國聯盟約
列甫外交秘史(續) J. W. Wheeler Bennett

新世紀雜誌社出版
每月出版二期一期一號六號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總經理處：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分售處：各大書局

南京圖書館藏